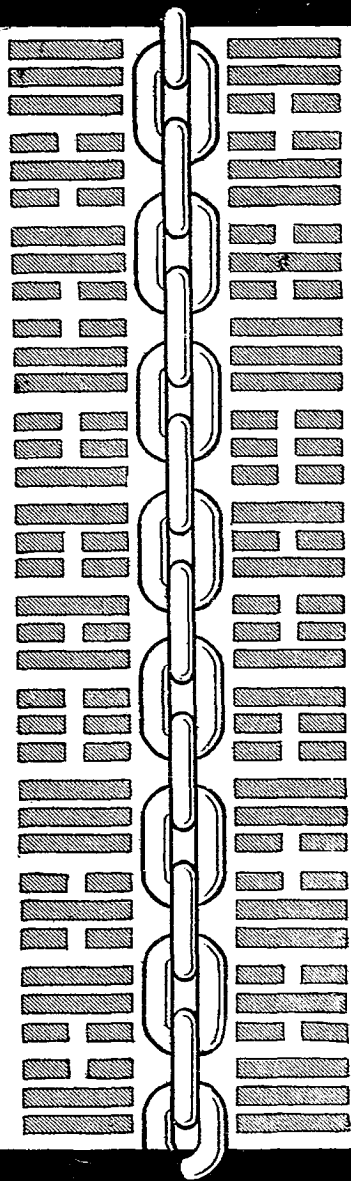


叢文知求

存亡的 關鍵

版出社版出知求



求知文叢第十三輯目錄

本輯介紹(底封裏)

存亡的關鍵

子強(一一六)

一、一個震驚中外的突然事變 二、任何人都會相信的罪狀 三、在所謂「軍紀問題」以外 四、生死存亡兩條路

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上

青之(一一六)

一、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規律與決定因素 二、民族統一戰線生長的四個階段 三、民族統一戰線的五個特點

日人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新認識

石濱知行(一一六)

一、中國民族運動的諸特徵 二、十月革命給予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 三、國共合作與中國民族運動的躍進 四、反共聯帝後中國民族運動的低落 五、支持抗戰的三種力量 六、再會吧，一東亞新秩序！

論中國化

方舟(一一二)

生命哲學小討論

孟堅(一一八)

假如英國失去印度

君萱(一一八)

一、印度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二、印度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三、印度在工業上的重要性 四、印度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五、正義與民主的幻滅

意大利故事(長篇連載)

高爾基(二二〇)

花癡
隧道

存亡的關鍵

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著者 子強 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代定處 美國書店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香港經售

星羣書店

大道中一七五號
電話二七九一五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本輯定價 壹元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預約 每六輯二元四角
每十二輯四元五角

MG
D693.09
540
1



3 1799 5220 9

存亡的關鍵

一個震驚中外的突然事變

一月十八日上海各華文報紙大都在第一版用大字標題登載了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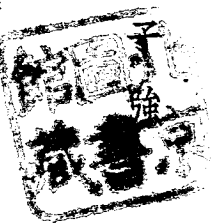
『重慶十七日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襲擊友軍，已由顧祝同長官緊急處置，繼以軍法將該軍全部解散，編遣峻事。該軍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在緝獲中云云』。

接着就是軍事委員會撤銷新四軍番號嚴飭長官的通令，說是根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十二月十五日的報告：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對日作戰陣綫，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涇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胆敢明白進攻我前方作戰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為日作俛，喪心病狂，莫此為甚云云』。

而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則聲明此事

『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緣中央為調整軍團部署起見，曾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午



令限新四軍全部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卅年一月卅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並指定繁昌銅陵一帶爲其北移路徑。該軍並不遵照命令行動，又復藉端要索，希圖延宕，顧長官爲維持軍令，復嚴令該軍遵由原地北渡。該軍悍然不顧，仍擅自行動，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涇縣向太平地區南竄，並圖襲擊上官總司令部，適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調至後方整訓，新四軍早已詳悉其行軍道路，及知該師於本月一日到達三溪，遂於四日晚全軍潛赴茂林，分左中右三路向該師進擊云云。

因此『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爲整飭紀綱，下令制裁』等等。

這就是根據軍事委員會關於新四軍事件的報告我們所能知道的一切。依照這個報告，我們知道新四軍皖南部隊被武裝進攻並撤銷番號是根據着兩大罪狀，即『抗命叛變』和『襲擊友軍』；而總括一句，就是『違反軍紀』。

可是實際的情形是怎樣呢？

到現在爲止，在嚴厲的新聞封鎖和輿論壟斷之下（大家都已經看到：甚至共產黨負責人周恩來氏關於新四軍事件的談話，在（英美通訊社中美、正言反共主筆的歪曲刪改之下，竟也變成了這次罪行的辯護根據），我們還不能得到關於這一巨大事變經過情形的詳細消息。可是（蘇北報紙所載以及各方面報紙無意中所透露出來的片斷消息，我們知道這次事變的經

過大致是這樣的：

在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聯名要求重慶軍事委員會重新考慮八路軍新四軍調防問題，未獲允准之後，新四軍皖南部隊為表示遵從上級命令（雖然這命令是毫無道理的）起見，即決定先將皖南部隊撤至江北，在去年年底以前，即陸續將主力部隊經蘇南移往江北，而在去年年底即開始將下餘部隊約萬人（包括傷病員兵及非戰鬥員近半數）全部集中於繁昌銅陵一帶準備渡江北。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方面日軍因預知新四軍準備渡江（由於何應欽及皖南親日份子的公開告密），突然增加了長江及沿岸封鎖綫的兵力，同時另一方面，大別山李仙舟莫德宏部隊也東下進攻皖北新四軍部隊，進佔繁昌對面的全椒無為諸據點，並公開聲言將消滅渡江的新四軍。在這種情形之下，皖南新四軍部隊為了順利完成移動任務，並避免渡江後同江北李莫諸部引起衝突，自不能不要改變北移路綫。結果是完全與軍委會發言人所稱顧長官『復嚴令該軍遵由原地北渡』相反，顧祝同司令上官雲相總司令，甚至蔣委員長都表示同意了新四軍改由蘇南渡江北上的要求，顧祝同並派有聯絡參謀在新四軍協同佈置，應允新四軍道經寧國時補發一部份餉彈。可是當新四軍道經五十二師防地時即遭襲擊，及至茂林大盩山一帶，即陷入預伏之七萬大軍包圍之陷阱中。結果，就發生了周恩來氏所認為萬分『遺憾』（不是『歉意』）的『千來來最不公平的一次戰爭』。這樣，一方面是餉彈不足，配備窳劣，人數不過萬人而且還有近半數的徒手傷殘病

兵；另一方面却是俱有中央所發給的機械化的配備，充足的餉彈，七萬人的大軍，另外還加上日軍的幫同掃蕩。新四軍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新四軍事件的大概經過。

誰都知道，新四軍乃是名震全世界的抗日有功的部隊；無論是根據耳聞目見，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敢於否認新四軍堅持大江南北游擊戰爭至四年之久的殊勳；而全國人民更是深切知道新四軍是真正屬於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裝，認爲它是抗戰所不可缺少的一支常勝軍。但現在，它竟在『違反軍紀、抗命叛變、襲擊友軍』莫須有的罪名之下被解散，萬餘精忠將士也竟在親日投降份子的陰謀之下被犧牲，他們都流了他們最後一滴血，但他們不是流在抗日的疆場上，而是流在以國家錢財、人民的血汗所培養建設的中央軍的手裏的。親日投降派及反共份子既然敢於這樣做，這就表明了他們必然已有了更龐大的準備投降的陰謀計劃，因而才敢不惜與全世界同情中國抗戰人士及全國人民爲敵。

而且誰也知道，新四軍乃是屬於共產黨系統的兩大部隊之一；它的組成乃是國共合作的基本條件之一，而爲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所承認的。但現在，却在親日投降份子一面答應經蘇南移防，一面引入預設陷阱、中途襲擊的巨大陰謀之下，一萬人被消滅了，新四軍的番號也被取消。皖南新四軍不過佔全部新四軍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在江北；新四軍番號既被撤銷，則中央軍的圍

剿江北新四軍乃是必然的事實。親日投降份子既然敢於這樣佈置並在實際進行這一計劃，就顯然表示他們已不惜造成國共兩黨的全面分裂，以期最後在與日聯合剿共之下對日投降。

因此，我們決不能把這一事變看做與抗戰大局無關的局部問題，決不能看做極平常極普通的純粹軍紀問題，而且也不能僅僅看做是國共兩黨之間的紛爭磨擦問題；親日投降份子在日本策動之下已經有意地闖下了滔天大禍，而且還準備繼續闖下去，這已經是有關國家存亡的巨大事變了。一切把這一事變宣傳為純屬軍紀的小事件，或是已經完全解決了的極平常極普通事件的說法，都不過是親日投降份子及其操縱下的反共頑固派，爲了緩和人心以掩護其實現製造內戰準備投降之進一步陰謀計劃的烟幕而已。

全國人民必定要把這一事變的真象方責任追根到底，並積極起來擔負起挽救危局的巨大任務。

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罪狀

根據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的通告及其發言人的談話，新四軍所犯的罪狀是『違反軍紀』，『抗命叛變』和『襲擊友軍』；而根據一月廿七日蔣委員長在國民政府擴大紀念週週的訓詞，則除了以上的罪狀以外，又加上『佔領防地』和『妨害抗戰』兩大罪狀，前後加起來，共總是五大

罪狀。

時諺有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可見製造藉口、羅織人罪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每一個真誠擁護抗戰頭腦清醒的中國人，却決不會爲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所愚弄，而必然要認清事實來作判斷。

在這五大罪狀裏面，看起來最有力量也最有決定意義的一條應該是蔣委員長所提出的『妨害抗戰』的一條，然而這却恐怕也是最不容易爲人所接受所承認的一條罪狀。

我們知道，新四軍每月領餉不過十三萬元，僅僅相當於中央軍的一個團，而械彈的發給甚至還趕不上中央軍的一個團；可是它的人數，即以中央所承認的兩萬人而言，十三萬元分配給兩萬人，光吃飯也還要差一半以上，別的給養及裝備更談不到。而在三年多以前，隊伍剛剛組成開到江南一帶淪陷區的時候，他們僅有的破舊步槍也還是殘缺不全，更談不到其他配備。然而，就以這樣貧乏得可憐的配備，在極不公平的待遇之下，四年來他們還是在艱難困苦中堅持了大江南北的游擊戰爭，打擊了日人利用長江沿岸豐饒區域實行『以戰養戰』的計劃，牽制了敵人十餘萬人之衆，協助和配合了友軍的抗戰行動，收復並保持了主要據點及交通綫以外的地區和人民，並動員了全體民衆湧進抗戰的洪流，真正執行了蔣委員長對於淪陷區軍民的指示和要求。這都是我們大江南北人民所耳聞目睹甚且親身經歷的事實，也是上海同胞所向來熟悉的實際情形。我們實在不

能並且無法相信這樣的軍隊會犯所謂『妨害抗戰』的罪狀。

至於所謂『違反軍紀』，我們都知道，三民主義是國共兩黨現在所一致擁護實現的共同目標，抗戰建國是國共兩黨所一致承認的最高國策，而抗戰建國綱領則是國共兩黨目前所一致同意的政治綱領；因之，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也就應該是國共兩黨人士一切行動的最高準則。就是說，凡是合乎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就都是對的，都是真正執行抗建任務的；反之，凡是違反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則都是錯的，是真正妨害抗建的。把這一原則應用到軍事方面來，就應該是：無論何種軍事行動或計劃，凡是合乎抗戰建國綱領這一最高準則的，就都是合乎軍紀的，是真正執行了最高統帥的命令的；凡是違反這一最高準則的，也就都是沒有執行命令，都是違反軍紀的。共產黨人會謂八路軍新四軍以五十萬人每月領餉只不過七十三萬元，械彈的補給幾等於無；如果此係實情，然而他們却在×後堅持游擊戰達四年之久，在收復區域普遍實行了民族團結、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三民主義，建立了使日人無法摧毀的無數抗日根據地，所牽制的日軍最近竟至達在華日軍總數的一半以上。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真正實行着三民主義和執行了抗戰建國綱領的最高國策，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真正執行了最高統帥的命令和最合軍紀的；反之，八路軍新四軍有大功而不賞，反而徵用民力，對其建築萬里長城封鎖綫，耗費國防經費竟達一萬萬元以上，並下令將其調離原有防地；甚至明假中央法令之名，陰行誘入聚殲之實，

實行與日軍聯合圍剿新四軍，陰謀妥協投降，組織反共賣國的貝當政府，這才真正是違反軍紀的；而最高當局，於大錯造成之後，不知反躬自責，亟圖改善政治以便挽回國家民族危機於萬一，反而聽信讒言，甘受矇蔽，指鹿爲馬，以非爲是，竟至承認親日投降派及反共份子所陰謀製造的既成罪惡爲正當，不惜冒鼓舞內戰之大不韙，却不能不說是有違其三民主義的信仰，放棄了其手訂的抗戰建國綱領，縱容甚至幫助了親日派投降份子危害抗建的陰謀活動。

再就『佔領防地』一條罪狀而論，我們也認爲是完全基於黨派私見的裁誣。因爲第一，游擊戰爭是要靠廣大地區來開展的，不能局促於一隅；中央如果真正爲了國家民族的至高利益，便應只根據八路軍新四軍開展×後游擊戰的成果而判斷其功罪，而不應左一個『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右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專着眼於保全私黨的既得利益，而置抗建大業於不顧，終至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神聖原則變成爲『國民黨至上』的掩護。其次，佔領防地的行動本身不能成爲一條罪狀，問題是在八路軍新四軍佔領了誰的防地和怎樣佔領防地。事實上八路軍新四軍所佔領的防地的絕大部份都是從日軍佔領控制下奪取過來的，在這些地方當日軍到來的時候，政府的黨政軍官員不是逃得淨光，就是在同日軍互相默契之下『和平共處』，並變本加厲地進行對民衆的壓榨；八路軍新四軍到來之後打走了日軍，攆跑了這些專害民衆的貧污官吏，清除了通日害民的軍閥餘孽，幫助民衆組織了合乎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權，在便利抗戰的要求之下

部份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難道從日軍佔領下或從勾通日軍的貧官污吏統治下恢復中國的政權是違反軍紀的嗎？難道在收復的防區內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違反軍紀的嗎？至於少部份地區因反共磨擦而為八路軍新四軍所佔領的，也要根據實際的是非曲直特別是當地人民的意見來作判斷，而不應單憑反共親日份子捏造的一面之詞，硬指八路軍新四軍為違反軍紀。反之，如張蔭梧秦啓榮等多方破壞八路軍防地，冷欣等用大軍逐迫新四軍撤離自己的防區，蔣鼎文等公然命令中央軍向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所承認的陝甘寧邊區進攻，實行所謂「收復失地」工作，這才真是侵犯友軍防地的違反軍紀行為，而韓德勤等的一再向新四軍進攻使其走頭無路抗戰無由，也不能不是最不合理的行為；然而負責領導整個抗戰的最高當局却一再裝聾做啞，充耳不聞，從不見有制裁之舉，使人民羣衆對國民黨有「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之感。這決不能說是符合於抗戰建國綱領的措施。

我們認為「抗命叛變」一條罪狀，也不合於實際情形。即就此次調防事件而論，實際上新四軍皖南部隊是已經決定渡江北調了，這可由大批非戰鬥員的早已移往江北，和渡江路綫的商討及渡江的實際準備為證，雖然少部份未能按照軍委會所規定的日期如期移動，但是這有原因的：第一，親日派頭子何應欽在事前豈佈了新四軍的調防命令，給了日軍以準備襲擊的機會，增加了新四軍衝破日軍封鎖綫的困難；第二，何應欽事前就佈置了大批軍隊在江北一帶，新四軍爲了避免

發生衝突不能不鄭重考慮行動的路綫；第三，新四軍渡江要衝破日軍的嚴密的封鎖綫，必須準備激烈的戰鬥，但顧祝同却一個子彈不發，還說新四軍『藉端要素』，因此也不能不使移動的日期展緩。假如說這算是違抗命令，那末這顯然是親日份子何應欽等所陰謀逼成的。況且由其軍事上的佈置可以看出他們的陰謀，起初顯然是企圖於新四軍部隊未渡江之前與日軍配合進攻將其消滅於江南，如果萬一被衝出渡江，則再由事前佈置在全椒無爲一帶的中央軍飛機殲滅於長江北岸。及至此一陰謀不得實現，親日派才不惜以七萬之衆將皖南新四軍誘圍聚殲於茂林一帶。因此，所謂『抗命叛變』，原不過是欲加之罪的一個藉口，而這也就證明：即使新四軍答應完全遵從不合理的調防命令，親日投降份子爲了達到其製造內戰反共投降的目的，也決不會讓新四軍全師北上，而一定要計劃中途消滅的。否則王敬久、李仙舟、莫德宏部的東進，霍守義部的南下，以及日軍在江北運河沿綫軍力的增加及其對於新四軍重要據點的轟炸——這各種方面有計劃的配合佈置，便是不可理解的了。更何況，如遵命移防爲『抗命叛變』，誘圍聚殲抗戰有功之部隊反爲執行中央法令，則中央法令直成爲反共投降政策之工具，在人民眼中今後將必成爲仇恨之對象。

最後就『襲擊友軍』一條罪狀來說，如前所述，這次事的變發生實際上是由於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等親日投降份子之有計劃的『誘入聚殲』陰謀的結果，假如說新四軍有罪，則其罪實在於未能充分認識親日派之陰毒狠辣至於斯亟的真面目，而過於相信『友軍』，終至落入圈套，使

抗戰實力遭受嚴重損失；而決不在於所謂『襲擊友軍』。因為新四軍決不會笨到敢以半數徒手的萬人之衆來襲擊七萬餘人的『友軍』，如果新四軍真有襲擊友軍的企圖，也決不會等到主力撤退後再來進行；而況根據四年來新四軍在江南協助友軍對日作戰的歷史，譬如僅就繁昌一地而論，就會從中央軍手中失掉，被新四軍從日軍手裏奪回後再交給中央軍，這樣來回交替了七次之多，對這樣一個俱有光榮的幫助友軍作戰歷史的部隊誣蔑其襲擊友軍，真是鬼也不會相信的。

這樣看來，所謂『妨害抗戰』、『違反軍紀』、『佔領防地』、『抗命叛變』、『襲擊友軍』等等，都不過是親日派投降份子自欺欺人以進攻新四軍的藉口，不過是爲了由此製造其反共投降的理論根據。而老實說一句，製造這些罪狀的親日投降份子自己尤其不會相信這些罪狀是真實的。可是，那末，新四軍事件發生的原因何在呢？

在所謂『軍紀問題』以外

是在所謂『軍紀問題』以外。

基本原因是由於四年來抗戰的結果，不管頑固保守勢力怎樣多示束縛限制民衆運動的發展，但在進步勢力積極推動和抗戰客觀需要的刺激之下，民衆勢力已經長大到從來所未有的程度，嚴重威脅了大地主大資產者的統治，他們的真正實現三民主義的要求已超過了大地主大資產者所願

允許的範圍，再加上抗戰中某些困難的增加，這就使得某些只圖私利妄顧國家民族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發生了動搖妥協（部份地於二年前就被從抗戰陣營中清楚出去），而對於民衆勢力的壓迫取締，因而也就不遺餘力。於是做爲民衆勢力之主導力量的共產黨也就成爲這些妥協動搖份子的主要攻擊對象。因而所謂『防止異黨活動辦法』，『處理異黨問題辦法』，及『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等也就在全國到處頒發實行起來，而所謂磨擦問題，齟齬事件接連發生，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之死於此等磨擦事件中已不下萬數千人，其他在各地被逮捕監禁的共產黨員及愛國份子更不計其數，甚至如有名的經濟學者馬寅初博士也竟因仗義攻擊最高行政人員中貪污現象而被逮捕，至今未釋。由此可知，今天的新四軍事件，實在是國內這些少數敗壞份子對民衆勢力進步勢力的更進一步的進攻，而決不關乎什麼『整頓軍紀』等等問題。

但是這次新四軍事件決不同於過去的任何磨擦問題或齟齬事件，因爲第一，這次事件所牽涉的範圍非常廣大，可能造成國共兩黨的整個的對立乃至分裂。這決不是一個『局部問題』或『小事情』，因爲解散了一個有名的對抗戰有殊勳的部隊，逮捕了他們的長官，屠殺了成千成萬矢志於民族革命在×後堅苦奮鬥了四年的戰士，抹殺了他們的功勳反而倒打一耙，說他們『防礙抗戰』、『違反軍紀』、『佔領防地』、『抗命叛變』、『襲擊友軍』……，爲了實行自衛以防親日派對八路軍製造同樣事件，也爲了保全抗戰實力繼續堅持抗日戰爭，共產黨和八路軍對這件事

是不會默爾而息毫無表示的；而且，老實說，即使共產黨和八路軍還願意隱忍下去，全國大多數人民也決不會眼看着這種極不公平事件之一再搬演而毫不過問。因此可知，如果最高當局對此事不能秉公處理（根據蔣委員長的訓詞看來，這種可能是很少的），跟着新四軍事件之後而來的糾紛與鬥爭以及這種糾紛與鬥爭的擴大與展開，是不能避免的。

因而第二，這次事變的如何發展，是不僅有關國共兩黨的存在和前途，而且對抗戰的持續與中國的存亡也有着決定的作用。如果國民黨大多數黨員不能及時阻止黨內少數親日份子製造分裂與內戰的陰謀，勢必重演一九二七年來的內戰局面，結果必使日本侵略者得以乘機攫取中國，達到牠四年以來以戰爭所未能達到的目的；那時國民黨也勢必為全國人民所唾棄，如果共產黨不能根據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堅持自己的嚴正的自衛立場，則勢必使全國人民陷於頹喪絕望之中，而少數反共投降份子更可為所欲為，將國家民族整批出賣，那時共產黨也勢必成為人民所厭惡的對象。

特別是，第三，這次事件完全是以何應欽為頭子的親日派投降份子在少數英美派反共頑固份子協力之下製造出來的巨大陰謀實施的第一步，接着第二步必然是圍剿江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這一步現在已開始進行），第三步必然是圍攻華北的八路軍和陝甘寧邊區，而最後則必然是在與日聯合剿共之下停止中國的抗戰，對日投降。

誰都知道，現在的親日派首領何應欽在西安事變時是主張內戰最激烈的份子，汪精衛的回國也就是他去電請回來的。在當時他的企圖是葬送被扣留在西安的蔣委員長，自己來做佛郎哥，在日本支持之下進行內戰，可是後來由於共產黨及東北軍光明正大的態度，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對繼續內戰和國民黨大多數份子識破了何應欽汪精衛的陰謀，打破了親日派的陰謀，結果使何應欽沒有做成佛郎哥，而形成了中國空前的團結，終至發動了神聖的抗戰。而今天，因為他看到可以利用反共運動造成內戰局面，使蔣委員長不能不接受投降的條件，然後他就可以一脚把蔣委員長踢開，同汪精衛合夥組織起中國式反共投降的貝當政府，於是就又舊態復萌地做起親日投降派的頭子，多方挑動國共的分裂和內戰，調防命令的擅自提早發表，江北二十萬大軍圍剿八路軍新四軍計劃在調防令發傳之前的周密佈置，乃至此次假借中央法令誘殲皖南新四軍事件的爆發，就都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投降份子的陰謀傑作。

但是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支持，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是難以有所作爲的，這次事件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日本侵略者爲了迅速解決中日戰爭以便抽身南下，所陰謀挑動起來的；另一方面，自從英美積極的大量援助中國之後，被民衆勢力的長大嚇昏了頭腦的英美派反共份子，竟至得意忘形，以爲此時一方面日軍緩和了牠的軍事進攻，另一方面有英美的大量援助，正是展開反共運動的千載良機，因而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便聯合了爲投降開

鬪道路的反共巨流。就是因此，我們才看到抗戰以來反共浪潮的空前的高漲和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爆發的。

所以，沒有英美派反共份子的積極協力，日本侵略者與親日派的陰謀還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問題的無比的嚴重性，也就在此。

生死存亡——兩條道路

因為這次皖南新四軍事件不同於過去的任何磨擦問題或齟齬事件，而是日本及親日派製造國共分裂和大規模內戰的開始第一步，更因為日本及親日派造製內戰陰謀的第二步即圍剿江北八路軍新四軍的計劃已在進行之中，目前時局已經緊急到萬分危險的地步，全國人民面前就擺下兩條道路：起來反對親日投降份子的陰謀，反對內戰，要求清除計劃策動新四軍事件的何應欽等親日份子，釋放葉挺及其他被捕新四軍將士，要求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切實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釋放馬寅初及一切被捕的愛國青年及所謂『異黨份子』，要求明令取消『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製造磨擦的小冊子，撤消西北對於八路軍的封鎖綫，停止對江北八路軍新四軍的圍攻計劃，要求召開真正民主的國民代表大會以解決的內政問題及國共衝突——這樣就可以阻止大規模內戰的爆發，粉碎親日派的反共投降陰謀，這是一條堅持抗戰團結進步使中國走向勝利復

興的道路；反之，聽憑少數親日反共份子的撥弄，讓他們繼續擴大他們的陰謀，製造全國的內戰——這樣就勢必對日中途妥協投降，葬送中國的抗戰，這是一條倒退亡國的道路。

全國人民一定要走可使中國走向勝利復興的前一條道路。

但是，這條道路，決不是輕易可以達到目的的，顯然，更艱難更固苦的抗戰局面已經到來，在同親日派投降路線的鬥爭中，我們必須準備更大的犧牲和遭受更多的磨難；如果能這樣，我們相信，中國的前途決不是無望的，因為——

第一，現在的共產黨已不同於一九二七年時期的共產黨了，這不僅是因為它已經有了自己的長時期戰爭中鍛鍊出來的五十萬大軍，也不僅是因為現在的共產黨已經有了集全國之精英的六七十萬黨員，而且是因為它已經沒有了一九二七年時期屈服妥協的機會主義路線，經歷了十年內戰三年抗戰俱有了對中國革命更深入更澈的認識和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而且它的路線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為廣大民衆所接受所了解。這是一支不可戰勝的隊伍，親日反共份子要想再演一次「四一二」事變擊潰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即就此次新四軍事件而論，新四軍在皖南不過只有萬人的力量，而皖北蘇北則尚有九萬之衆，新四軍絕大部份的主力仍在，將來它也是不會被消滅的。

第二，全國人民是主張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是反對投降、反對內戰、反對倒

退的。四年來的抗戰對於全國人民決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驗已教育了全國民衆，使他們學會了認識某些人是言行一致真心抗戰到底，真正忠實於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另外些人却是只會規定漂亮綱領和說漂亮話，而實際上却處處倒行逆施危害抗戰：假『統一』之名，而行『倒退』之實；以服從命令的藉口而行滅共之計劃；空言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實際上却到處壓制人民運動捕殺愛國青年及硬直的名流學者；口說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實則陰謀以反共達到其出賣國家民族利益——那些騙子們，現在再也不能欺騙人民了。如果這些騙子仍舊繼續以『口是行非』爲得計，則最後必然爲全國人民所唾棄。

第三，其他黨派及國民黨內大多數是反對內戰主張團結進步的，即使國民黨中現在還有些黨員爲親日份子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不惜直接間接幫助他們進行內戰投降的活動，然而事實的發展總會使他們認識清楚親日反共份子的真面目。而這些真心爲國家爲民族的國民黨大多數份子，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也爲了國民黨的前途，在反對投降反對分裂的鬥爭中，終必發生偉大的作用。

第四，蘇聯力量的無比強大及世界革命勢力逐漸高漲對於中國的抗戰反投降的鬥爭，也一定能給於巨大的助力。英美兩國目前顯然也並不完全同意英美派反共份子這次與日本及親日派合作的反共『傑作』，因爲英美深知目前國共分裂其利在日本，英美如果積極加以支持，將無異自

殺。

由這裏可以看出，即使日本及親日反共投降派的陰謀活動不能被阻止而使國內局勢更加惡化下去，問中國的前途也並不是悲觀的，全國人民大眾一切抗日黨派及共產黨八軍路新四軍必然仍繼續抗戰下去，並必然繼續堅持辛苦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那時，困難將更是空前增加了。

那末，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全國人民只有馬上起來以自己的意見和力量粉碎親日反共份子的陰謀，才能挽回目前的空前危機。

緊要更正：本文叢第十一輯邵翰齊君作『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魯迅』下篇第一句『如果說，魯迅在五卅時代主要是通過民族的自我批判來喚起民族自覺。』被排錯爲：『通過民族的自我來批判喚起民族自覺。』又四二——四三頁『在過程中』係『在民族解放鬥爭過程中』之誤。

又同輯子強作『回顧與展望』二十九頁第十行『目前帝國主義的兩大集團正在地中海區域醞釀着一個新的大規模戰爭，配合着地中海戰局，在遠東亦正醞釀着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被誤排爲『目前帝國主義的兩大集團正在地中海醞釀着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特此更正。

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上)

青 之

一 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規律與決定因素

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正如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一樣，有其一定的發展規律。從開始萌芽起直到今天爲止，民族統一戰線總是依照歷史所安排的具體條件向前發展。因它常常違反某些固顧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者的主觀意志，但却符合一般擁護民族利益的革命民衆的殷切願望，因爲革命民衆的利益就是民族國家的利益，他們的願望正是和客觀的歷史發展要求一致的；反之，自私自利者的利益經常在和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他們的意志當然也就與客觀的歷史發展要求相抵觸。誠然，歷史的可能道路本有兩條：一條是進步的光明的前途，另一條是倒退的黑暗的前途，但就今日中國和世界的具體情勢來說，前者大體上是對後者占優勢。因此，作爲進步勢力與倒退勢力競賽的評判員的『歷史老人』，對於願意前進者總是慈祥愷悌，而對於甘於沒落者總是冷酷無情。自然，自私自利的一羣根本就不願也不敢正視歷史的鐵面，他們有的是阿Q主義精神，而這種精神又是用了比阿Q更沒出息的態度表現出來。他們壓根兒就否認有民族統一戰線存在，甚至連統

一戰線這個名稱也要給塗抹掉。但是事實呢？統一戰線不但沒有給否認掉，塗抹掉，並且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堅強基礎。四年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產生了以國共重新合作爲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鐵面無情的歷史事實給了某些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好漢』以慘重打擊。在現在，這些『好漢』又要重溫過去內戰的舊夢，他們企圖分裂統一戰線，但大多數人民擁護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又給了他們以絕大阻礙。歷史總是違反少數民族壞蛋的主觀願望向前進展的，總是不斷嘲弄和抗拒冥頑不靈的開倒車者。滿清王朝的功狗會國藩說過一句話：『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能遏』（原才），他心目中的『衆人』當然不過是一二人的奴隸（他說：『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但倘把這句話加以消毒，從革命的立場來看『衆人』，我們却可以見到一個歷史真理：民衆的趨向，就是天下的大勢，這趨向和大勢是任何暴力、任何逆流所阻遏不住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正是表現民衆趨向的革命大勢。不管少數喪心病狂者怎樣企圖分裂統一戰線，想從這裂口走向投降的血腥道路，但廣大民衆的反抗不能不引起他們的夢魘。自然，這並非說，他們的陰謀與活動不會危害民族統一戰線，我們不能過低估計了此種危害。分裂的危機目前還是嚴重威脅正在苦戰中的中華民族。不能清醒認清這一現實，只是一味用無條件的樂觀與自譬自解來安慰自己，那是與糊塗沒有分別的『老實』。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反對一切有害的悲觀，要根據歷史的規律認

識統一戰線的現狀與前途，要百折不撓地和威脅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外危險鬥爭。必須相信，克服這種危險的條件是有的。如果全國覺悟的人民能夠依據有利的條件去堅持結團、抗戰與進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輪必然要衝破一切障礙物，使少數民族壞蛋由夢魘而號哭。即使一部分動搖份子從現在的統一戰線分裂出去，但統一戰線將更在新的革命基礎上成長起來，結實起來。

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是為極複雜的歷史因素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日民族矛盾、社會階級關係、國內一般局勢、國際情勢、民衆的革命實踐與革命的領導力量。

民族統一戰線首先是受中、日民族矛盾——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所決定。遠東，帝國主義滅亡中國民族的政策在他陷於崩潰以前，是決不改變的，而且他的侵略戰爭的野蠻性與殘酷性只有日益加厲，使中國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但這種侵略戰爭的失敗暗影又嚴重威脅遠東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從侵略戰爭的野蠻性與殘酷性中認識了祇有堅持不妥協的抗戰，是民族唯一的生路，同時又從侵略者的日趨衰疲中堅定了抗戰的自信。根據了長期的血的經驗，一切有民族良心的人都認識並且堅持『合則存，分則亡』這個真理，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線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理由。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事實上是超過一切，民族矛盾沒有法子緩和，因而統一戰線的基礎也就很難為黑暗的逆流所沖毀。但是，我們不能不充分估計侵略者分裂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與策動，今天國內製造磨擦的濁潮一部分顯然是由於侵略者通過曲折的關係掀起的。（石友三

等的「反共」戰爭，就是一個極好例證）。可是，中國人民大眾又能給予侵略者分裂民族團結的陰謀與策動以堅決打擊。這種鬥爭將要繼續下去，直到抗戰勝利爲止。因此，中、日的民族矛盾的發展與變化不僅決定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與持久，抑且決定了分裂危機與反分裂鬥爭的對抗與消長。

民族統一戰線不是離開國內的社會階級關係而存在的，反之，民族利益是通過具體的階級利益表現出來，因此，在現實的中國戰場，並沒有抽象的民族統一戰線。雖則直到今天爲止，對外的民族矛盾是超過國內的社會矛盾，但各個階級、和各個階層對於民族戰爭與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是並非一致的，最革命的階級和比較落後的階級就用了不同的尺度來測量民族前途。在抗戰的前夜和初期，大資產集團和大地主在侵略者的砲口威脅之下，曾經一度傾向於以自己爲中心的民族團結，但隨着抗戰的發展和侵略者的誘脅，他們就日漸和抗戰與團結背道而馳（詳見本文第四節）。至於買辦資產階級，屬於日系的早已大都做了漢奸（其中自然也不乏深明大義者），屬於歐、美系的，對於團結與進步也逐漸形成爲敵對的力量。在另外一面，站立着工農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開明的中等民族資產階級與中小地主，他們自始至今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支持力量。工農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他們堅持抗戰與團結最力，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海外僑胞和開明的民族企業家與中小地主則因爲在侵略者的殘暴摧壓之下，不能挺直脊梁，要求抗

戰與團結繼續下去，愛國的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工農大眾是並肩戰鬥的。這就是今日中國各階級各階層對抗戰與團結的態度。顯然，統一戰線的前途決定於階級力量的對比。如果革命階級在抗戰中能夠繼續增長自己的戰鬥力量，則統一戰線可以鞏固和發展，一直延長到抗戰勝利之後。反過來說，如果反動的社會力量壓倒革命的社會力量，統一戰線的前途是極黯淡的。幸而就當前的情勢來說，我們看到堅決保衛民族的革命力量正在不斷滋長。

決定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三個因素，是國內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變化與發展，也就是抗戰的動態。民族統一戰線本身推動了抗戰與民族生活進步，這是再明顯沒有的事。但轉過來，這種進步也給予統一戰線以極大影響。從國內實現和平團結以後，中國民族在各方面都顯示了欣欣向榮的氣象，然而這種氣象並非直線地平衡地向上生長，却是曲線地在不平衡狀態中發展的。所謂曲線的發展，即是說，在某一階段，進步飛快，但在另一階段，又呈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但經過前進勢力與逆流勢力的鬥爭，進步的活力又往前增強起來。然而這種鬥爭不是一下子可以決定勝負的，進步勢力還可能遭到多次的挫折。不過，就總趨勢來說，曲線的上昇是無可懷疑的。所謂不平衡的發展，有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各區域的不平衡，在某些區域裏，進步迅速，在別一些區域裏，進步緩慢，在更另外的一些區域裏，表現了退步。其次是各部門的不平衡，就總的形勢來說，軍事方面，進步較快，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一般地還相當落後，而它們彼此間的進步

性與落後性又是參差不齊的。最後是各社會集團的不平衡，可以參見上面一則的解說。一切這些民族生活的矛盾、變動和發展，對於統一戰線的規定力量都是很鉅大的。如果抗戰的團結與進步的趨勢能够擋住並克服投降分裂的退步的傾向，統一戰線將有闊大的光明的前途，反面的情形將使中國革命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轍。但就總的形勢來說，一九二七年的悲劇是不會重演的。

決定民族統一戰線的第四個因素，是國際情勢的變化與發展。中國的抗戰給予國際關係以極大影響，但國際情勢也不斷影響中國的抗戰，這是任誰都看得清的。如衆周知，國際間基本上分爲兩大勢力，一方面是革命的進步的正義的勢力，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苦大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人民大眾都屬於這一行列，另一方面是反革命的、沒落的、非正義的勢力，一切帝國主義和侵略集團都屬於這一類。這兩種勢力的消長與矛盾經常在影響中國民族統一戰線。但實際的情勢還更複雜，因爲在帝國主義營壘內，矛盾的發展在日益加厲地破壞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安定性，並且今天這矛盾已爆發爲殘酷的爭霸戰爭，這戰爭看來只有繼續延長和擴大，交戰的雙方都企圖把中國拖下血海，這就使中國大資產集團與大地主相互之間也發生爭鬥。一部分人企圖經過德、意的調停走貝當路線，最後變成軸心國的貓腳爪，另一部分人則打算把中國抗戰變爲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附屬物、走英、美路線，也就是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的路線。落後的小資產階級與智識份子也受到帝國主義角鬥巨浪的波動，搖移不定。不管那一方面的勢力優勝，

對於統一戰線都是不利的，貝當路線一派正在以全力破壞抗戰與團結，而英、美路線一派也是磨擦與倒退的中心策動者。但國際間還站着一個巨大的安定力量，他對帝國主義戰爭堅持中立政策與和平政策（自然，如果他的中立與和平受到任何一方面的破壞，他只有獨立地採取自衛政策），但對於反帝的民族解放戰爭，則實行積極的援助政策，這個力量誰都知道是二十多年來一直支持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蘇聯。蘇聯援助中國抗戰的堅定性與正義性一天一天被中國人民所認識，所歡迎。現在誰都可以看得出，中國民族愈團結，愈進步，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必然愈加增強。一切分裂中國團結危害中國抗戰的陰謀，必然為蘇聯所斷然反對，一切增進中國團結加強中國抗戰的力量，必然為蘇聯所熱誠贊助。人是不能懷疑蘇聯對於中國的抗戰與民族統一戰線的長期支持的，因為援華行動正是由蘇聯整個對外政策——特別是援助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出發的。當然，蘇聯決不『輸出』革命，決不干預任何國家的內政，但假如任何帝國主義集團足以破壞中國的抗戰和團結，假如中國不幸發生大分裂，蘇聯必然考慮援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新政策。（雖則如此，我們還是要以全力反對分裂中國團結的國際陰謀與國內逆流，因為一旦有這種不幸的局面到來，中國人民的抗戰固然不致中斷，但必然處在更困難的環境中）。此外，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勞苦大眾對於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援助，及其對於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利影響，也是必須充分估計的。總之，如果國際間的革命勢力不斷發展，而反革命勢力不斷削弱，則中國的民族抗戰

與統一戰線必愈見光明。現在，這種形勢已經很清楚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中國民族統一雖是為客觀的國內外條件所規定，但並非自流的，而是依靠廣大人民及其指導力量的革命性、創造性與組織性推動的。因此我們必須指出最後兩個決定因素（第五第六的因素），一個是全國人民的覺悟與實踐，另一個是革命指導的堅定與正確。

沒有廣大人民的自覺鬥爭，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與增強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民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和三年多的生動經驗，看清了分裂的禍害和團結的福利，他們用全力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倒退與內訌。但是，在實際上，人民大眾受到各種逆流的阻礙，使他們的組織力量和鬥爭力量無形中大打折扣，這是一個異常的缺憾。民眾要有充分把握維繫團結，制止分裂，就必須更高地增大政治覺悟，發展革命組織，展開民主鬥爭，擴大武裝力量。因為民眾運動與民主運動乃是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指標，不能增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就不能鞏固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顯然，今後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弱，是決定於人民大眾在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的積極性、堅韌性、警覺性與突擊性，民眾愈是有力量的來過問國事，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愈有光明的前途。

要使民眾決定民族統一戰線的實力不斷增強，不但需要廣大民眾自己的覺醒與鬥爭，而且需要正確的革命指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領導的錯誤是要負重大責任的。現在，要保證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精銳，就必須加強民眾的革命領導。誰（指集團，不是指個人）能正確地堅

定地引導人民走上正確的勝利坦途，誰就能够得到民衆的擁護。爲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團結的利益，革命先鋒隊本身的增強是萬分必要的，它必須要有日益增強的威信，必須要有維持威信的實力，又必須要有擴大實力的根據地，而實力又能加強根據地，根據地又能鞏固威信，威信又能助長實力，威信、實力與根據地，這就是今天增強革命先鋒隊、保衛民族革命戰爭與民族統一戰線的三個連環。但這三個連環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依托廣大民衆的力量生長的。民衆力量乃是革命的地母，是一切革命領導力量的源泉。革命先鋒隊必須『經常保持與廣大民衆的聯繫』，（史太林），它要明確地總結和凝鍊民衆的意志和願望，要集中地表現和傳播羣衆的感情和吶喊，要充分估計羣衆的創造性與落後性，要深刻了解歷史的豐富性與多變性，因爲『一般的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比最先進階級的政黨，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內容，總是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也祇是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實現革命的，却是最激烈的階級鬥爭（在今天中國，要加上民族鬥爭——引者）所鞭策的數十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列寧：左派幼稚病）。維持和發展與羣衆的密切聯繫，正是保證革命領導的正確與堅定的不二道路。革命先鋒隊在決定和實施一切革命戰略和策略的時候，要周密地估計革命發展的每一個具體條件和矛盾因素，要確切地把握羣衆革命性發展的強度與深度，然後巧妙地規定革命羣衆的攻勢與守勢，規定革命力量的適當計劃，

並爲實現這些計劃而堅韌奮鬥。在這過程中，革命先鋒隊更必須『善於領會和使用一切社會活動的形式或方法，必須時時準備，以便極迅速地，突然間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別一種形式。』（同上書）而且必須在廣大羣衆中間用行動，理論和事實確鑿證明：革命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利益是與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苦心孤詣是符合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統一原則的。革命先鋒隊必須經常走在羣衆的前頭，在羣衆面前起着光輝的模範作用，指導羣衆運用有利的條件前進，克服一切悲觀困難和危機，把不利因素轉變爲有利因素。要增強羣衆的自信心和警覺性，首先就必須革命先鋒隊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和警覺性，要鍛鍊羣衆的堅韌性和創造性，首先就必須發揚革命先鋒隊的堅韌性和創造性。很明顯的，革命先鋒隊的指導正確和影響擴大，乃是保證民族統一戰線的帶有決定性的條件。現在，中國是有了這樣的革命先鋒隊的，它比一九二五——二七年時代進步得多，強壯得多，它正在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民主運動走向朝氣勃勃的原野，它的威信、實力與根據地，正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養料，火力與支柱。

顯然用不到說明，上面的六個因素是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開的。民族矛盾的變化與發展必然影響社會階級的結合與分化，反之亦然。同時，國內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複雜情勢、國際政治的變動狀況也必然影響中、日的民族矛盾和中國的階級關係，反過來，也是一樣。最後，人民的實踐與革命先鋒隊的領導也可以推動中日間的劣勢與優勢的相互轉換，推動各階級力量

對比向有利於革命的方向轉變，推動中國一切方面的進步與革新，推動國際情勢向有利於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如此複雜多變的條件與因素中變化和壯大的，它不能是抽象的統一物，而是包含着矛盾的，它不能是直線地向前進展，而是依照螺旋形上昇的，它不是四平八穩的，而是在不平衡狀態中生長的，它不能在短時期達到一個極境，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邁進的。它可能遭到重重的難關與挫折，包含各式各樣的弱點和缺點。但它自身又具備了和可能生長出克服這些困難、挫折、弱點與缺點的條件。清醒地了解和運用民族統一戰線的科學規律，（首先要把握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環境與能動作用），這是一切中國人民最迫切的革命課程。

二 民族統一戰線生長的四個階段

中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過程，按照具體的革命歷史變化，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廣大民衆的憤怒與敵愾，在要求抵抗侵略的熱狂呼聲中，爆發了壯烈的救國鬥爭與局部抗戰。在這一時期，有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上海三萬餘人的民衆大會，十二月間南北各地學生的赴京大請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戰，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東北義勇軍抗戰等重要事件。在這些救國運動與局部抗戰中，民族統一戰線在艱苦中萌芽着。一九三一年尾，中共提出

武裝人民進行民族解放戰爭的口號，一二八戰爭時期上海各界民衆在工農商學兵聯合的口號之下，以工人爲主體聯合援助十九軍路抗戰，一九三二年五月瑞金公開對×宣布民族防禦戰爭，並表示願與全國抗×武裝部隊訂立戰鬥協定，一九三四年五月間公布三千多人簽名的『中國人民對×作戰基本綱領』，都是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前奏。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總結了四年的民族危機與救國鬥爭，發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救國的十大綱領，這宣言給了國內團結準備抗戰以有力推動，它結束了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期，準備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新階段。從九一八事變直到『八一宣言』，這一期間，可稱爲民族統一戰線的孕育期，它的特徵是：由於遠東帝國主義對中國獨占式的侵略，改變了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及蘇聯的關係，這就使中國革命先鋒隊與覺悟民衆確定了和支持了聯合抗×的革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之下，人民自發的愛國運動與革命先鋒隊的抗×戰略日益取得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並且逐漸由一般民衆擴大到了一部分民族資產者。但是就全國形勢來說，統一戰線還只是在各大都市和某些局部抗戰區域與民主區域內醞釀着，還未形成爲全面的民族統一戰線；同時，階級的內戰還在隨民族危機一同進行，南京國民政府正在從事『安內』，而中共也未放棄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各地的局部抗戰因爲得不到中心的統一的援助，而先後失敗了，人民與政府爲了對外問題發生了嚴重衝突。雖然如此，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與影響還是在不斷擴大中，民衆對於統一戰線的同心運動，一天一天顯示了停止內戰一致禦侮

成爲不可阻遏的怒潮。在這一時期，民族革命運動的主要策略是：團結一切願意抗×的民衆力量與武裝力量推動抗戰，反對安內戰爭與不抵抗政策，孤立不抵抗主義者，在每一個羣衆運動與局部抗戰中，結成人民統一戰線，增高人民抗×情緒，用各種方式去喚起羣衆，組織羣衆，把抗×救國收復失地的民族運動與要求保障民權改善民生的民主運動結合起來，爭取一切愛國份子參加團結禦侮的運動。從請願、遊行、示威、集會、罷課、罷工，簽名運動、一直到參加局部抗戰，縮結抗戰同盟，都是愛國民衆及革命先鋒隊推動統一戰線的重要形式。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宣布民族統一戰線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一二九運動不但團結了廣大青年學生走向團結禦侮的革命大道，而且促起了全國救亡浪潮的高漲，緊接一二九運動，有上海、北平文化界救國的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息爭禦侮，成爲人民急迫的要求。反映這個要求，中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有改工農蘇××政府爲蘇××人民政府，改工農紅軍爲抗×人民革命軍的新決議，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更放棄了反蔣的口號，在同年八月間發表了要求國共重新合作恢復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致國民黨書』。革命的曲線運動通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而走向豁然開朗的境界。十年的內戰完全結束了，爲侵略者所策動而爲親日派所佈置的內戰陰謀給徹底粉碎了。經過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中共向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建議，國共合作的談判終於築成了民族的新長城。從一二九運動直到七七抗戰前夜，民族統一戰線是在如下的形勢之下向前

發展的：（一）由於遠東帝國主義無止境的侵略，使民族危機達到了全國人民不能繼續忍受的嚴重程度，甚至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也深深感受侵略者摧壓的痛苦，在中日民族矛盾絕對增漲之下，國內各階級之間的矛盾愈益相對地降低了；（二）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情形指明對戰的社會集團與政治集團陷於雙方僵持的局面，這就是說，任何一方都不能對於對方占絕對優勢，而予以消滅；這種相對的階級均勢使內戰只能膠着於纏綿狀態中，這是促成對戰的雙方攜手禦侮的重大原因之一；（三）全國人民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日益認清了嚴重的民族危機是由於民族的大分裂引來的，他們知道內戰下去，只有招致民族更進一步的大災難，而團結禦侮，才是民族國家死裏求生的道路，因此他們經過輿論、組織與行動迫切要求國內和平統一，一致對外；（四）中共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和讓步息爭的政策，一方面日益擴大了團結禦侮運動在民衆中的影響，另一方面爭得了社會上層份子的贊助，特別是中共的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消釋了各方面對於他的政策的誤會與懷疑，贏得了國內各階級的同情和擁護；（五）中國國民黨的明達之士和進步的社會上層份子面對着日益深重的國難，深刻體認了最大的敵人不在國內，而在國外，他們苦心孤詣地努力於對內息戰、對外禦侮的運動，衝破了實現國內和平的困難，對中共與愛國民衆伸出了偉大的友誼之手；（六）救國運動的影響深入了全國各國的軍隊，使軍隊對於內戰日益感到厭倦，而傾向於槍口對外的號召。西安事變的一幕歷史劇特別表明了這一事實；（七）安內第一主義

與和平建設幻想事實上已證明完全失敗，侵略者的鐵蹄不容許中國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太平生活，或者是團結抗戰而生，或者是分裂投降而亡，這就是當時歷史要求中國民族選擇的兩條道路；要求抗戰團結的勢力對甘願繼續『安內』的勢力占了決定優勢；（八）國際法西斯侵略集團日益遭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反戰爭的人民大眾的猛烈反對，他們督促政府反抗侵略集團，制止××對華侵略，而蘇聯與中國的邦交在繼續改善中；中國人民及其領導者深知只要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便可以取得國際特別是蘇聯的援助。在這一時期，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表現了如下特徵，這就是：由局部形式發展為全面形式，由國共對立發展為國共和好，由階級內戰發展為全國統一；同時，抗戰團結的運動和繼續內戰的傾向展開了不斷的鬥爭，前者終於戰勝了後者，但並未完全消滅後者的潛伏危機；此外，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一同表現了高度的發展，團結抗戰與和平統一的口號已深入廣大羣衆中間。適應當時的情勢，民族統一戰線的運用表現在：根據階級矛盾從屬於民族矛盾的原則，以全力推動有實力的當局和軍隊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和解和消弭足以滅弱國防的內戰與內訌，爭取全國和平統一局面的實現，孤立頑固的安內主義者與親日派，和一切願意抗戰的集團與份子結成聯盟，發展民衆運動與民主運動，積極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要求停止屈辱外交，實行獨立外交。

國內的和平團結準備了民族抗戰的歷史基礎，七七抗戰特別是八一三抗戰起來之後，民族統

一戰線進入了第三階段。國共兩黨表現了更進一步的合作，兩黨軍隊並肩作戰；國內各階級各階層在一致抗戰之下，實行了廣大的互助。首先是工農在抗戰建國中起了英勇的模範作用，他們忍受絕大的痛苦與犧牲，或者投奔前線，協助軍隊，或者積極生產，安定後方。那漫山遍野的數百萬軍隊與游擊隊大都出身於農工。一部分民族資產者從沿海一帶撤退其工商事業與資產轉移到內地去，給了抗戰建國以相當助力，一部分地主和資本家對勞動羣衆實行了一定限度的讓步（如山西、河北一部分地主實行減租減息）。各黨各派和各階級各階層的團結日益增強了。總之，民族統一戰線空前擴大了，這反映在政治方面，就出現了許多進步與革新，如政治犯的釋放，國防會議的成立（有各黨代表參加），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全國公開的半公開的地位的取得，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修正，民主自由的相當開放，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舉行，抗戰建國綱領的頒佈，國民參政會的召集，……所有這些都是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氣象。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與鞏固在當時自然有其歷史基礎與客觀條件：廣大人民在侵略者暴力踐踏之下，受到了慘重的損失與犧牲，特別是工農，從血的事實中認清了民族的仇恨，抗戰的起來正符合了他們的夙願。他們要求堅決抗戰，甘願忍耐一切痛苦，投入抗戰建國的洪流，這是一。侵略者的砲火摧毀了中國無量的民族財富與建設事業，許多有資產、土地和有地位的人，失去了他們的一切，或者減弱了他們的活力，他們很自然的傾向於團結抗戰，這是二。侵略者在戰爭初期，是採取猛烈的軍事進攻，戰

爭決定了一切，推動了一切，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各集團面對着共同的外來威脅，不得不手攜手地團結在一個廣大戰線上作戰，這是三。抗戰帶來了民族各方面的重大進步與改革，這些進步與改革對於嚴重的戰爭——戰略的防禦階段成爲不能缺少的力量，它們事實上有助於團結與合作，因爲沒有團結與合作，要實現進步與改革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四。中國人民經過了數年來救國運動與統一戰線的教育，在政治認識上比以前有了更大進步，這是五。中國兩大政黨在各方面表現了並駕齊驅的的進步，在政治上、軍事上都保持了密切的接觸與相當的互助，這是六。在抗戰的緊張與進步的飛躍之中，動搖的投降的份子不能公開蠢動，當他們一露面，就遭到人民猛烈反對，而不能不很快從抗戰營壘脫逃，去『上別的樹』，這是七。中、蘇關係因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與蘇聯援華政策的實施，而愈加密切起來；同時資本主義人民大眾反對法西斯主義要求集體安全的運動猛烈發展，給了侵略國以慘重打擊，鼓勵了中國人民抗戰的積極性，促進了中國的上下團結，這是八。在這些條件之下擴大和增強的統一戰線，表現了如下的特徵：這就是統一的國防軍隊的建立，中共軍隊作爲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對統一抗戰的參加，以國共互助爲基礎的政治、黨務、軍事、經濟各方面的重大進步，國民黨對於中共建議的部分採納，國共兩黨以外的小黨派參加團結抗戰的表示，民衆運動在不平衡狀態中的發展與聯繫，抗×根據地的次第建立。在這一時期，統一戰線政策之運用，是強調持久戰的階級合作，實行各階級各黨派的互助互讓政策，爭取

中國國民黨恢復爲民族革命聯盟，在互助中發展各階級各黨各派的實力，爭取民衆運動的合法存在與公開發展，制止親日派投降派的陰謀與活動，爭取民主運動在團結合作中更進一步的發展。

從抗戰轉入於相持階段後，正如論新階段作者毛先生的預計，民族統一戰線開始進入了新階段，直到最近，這一階段才正式成熟。這一階段因着抗戰情勢、國內政局和國際形勢發生了絕大變化，影響到民族統一戰線，一方面，統一戰線在質和量的方面有了不平衡的發展，另一方面，統一戰線內部的困難與矛盾却在猛烈發展起來，這就是說，統一戰線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它的轉變前途可能有三個：或者是抗戰、團結與進步力量絕對壓倒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力量，使原有的統一戰線能夠持續下去發展下去，堅持到抗戰勝利以後，完成三民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國事業；或者是這兩種力量的對比在極複雜的形勢中一時不能決定優勝劣敗，統一戰線發生一個突然的裂痕，但經過抗戰團結與進步的民衆力量的堅決奮鬥，很快戰勝了逆流的勢力，最後集結新戰鬥力，組織新的統一戰線，把抗戰引到全面勝利的道路上去，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或者是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氾濫爲災，沖潰了以抗戰、團結、進步的勢力爲脊梁的統一戰線，使民族民主革命毀滅了，使中國民族沈入於萬劫不復的亡國血海中。前兩個可能是殊途同歸的，是向光明的美好的朝氣勃勃的方向進展的，而最後一個可能則是與前面兩者背道而馳的，是向黑暗的悲慘的膿血淋漓的方向倒退的。但這兩個可能就現狀來看，不是均等的，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

不是宿命地各占三分之一的，它們要經過劇烈的鬥爭。不過，前兩者相互間的矛盾和它們與後者的鬥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下面要討論到統一戰線在現階段的特點困難與危機。

三 統一戰線新形勢的五個特點

隨着整個革命運動的推移，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形勢。這個新形勢是中國抗戰的一個嚴重關鍵，或者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由於革命民衆的堅持，經過空前艱苦的鬥爭，由此克服逆流，走向澈底勝利，或者是中國抗戰被頑固集團所出賣，所變質，由反共內戰引起全國大分裂，把中國投入黑暗深淵。這個緊要關頭恰如醫學上所說的『極期』(Critical)，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分歧點。全國人民應該一致起來迎接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加強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粉碎反共頑固派的陰謀，制止反共內戰的繼續爆發與全面展開。

爲要渡過當前的艱困局面，戰勝分裂投降倒退的嚴重危機，中國人民必須在各方面適應革命的新環境，這首先就必須對於統一戰線發展的新形勢與新任務有正確的了解。這裏，我們要剖析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並且根據這些特點來規定我們對於統一戰線的新任務。

論新階段的作者早就指出了：『抗×戰爭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之時，同時即是抗×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之時。』然而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總是極端複雜而曲折的。中國抗戰轉入

相持階段，一方面是比以前進步，但另一方面也比以前困難（毛先生早已作了這個預計），這種矛盾情形表現在統一戰線上尤其尖銳。而且必須指出，作為相持階段的一個重要特性的，是民族統一戰線所遭遇的困難特別來得嚴重，它像危險異常的暗礁一樣威脅中國抗戰的航程。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與革命民衆爲了和這種困難鬥爭，耗費了而且正在耗費着無量的鮮血和精力。直到現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困難比先前更加增大，因而中國民衆特別是革命先鋒隊的鬥爭任務也比先前更加艱鉅。在今天，一個極顯明的對比擺在我們面前：一方面，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在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鬥爭中，其力量表現了空前的發展，同時作爲這條路線的堅決領導者的工人階級政黨不論在威信上、組織上、政權上、力量上，都呈現了突飛猛進的氣象，另一方面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及其政治代表，不是公開或暗中進行『和平運動』，就是對抗戰表示可恥的怠工，在各方面大鬧分裂，大開倒車。中國資產階級本具有二重性，如果說，在抗戰第一階段，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進步性是蔭蔽了其妥協性與反動性，那麼，抗戰進了第二階段，尤其是在最近，資產階級的妥協性與反動性就壓倒了其革命性與進步性。（這種情形因着封建勢力的侵蝕，是更加顯著了。）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已經成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阻力。今天，中國人民不應該對大資產階級有任何幻想，因爲他們和封建大地主已經成爲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爭奪的重要對象，他們一部分已經公開滾入侵略者的刺刀保護之下，一部分則企圖依賴英、美在將來謀取所謂「光

榮和平」，不管怎樣，他們對於人民大眾的進步力量的恐懼是共同的。這就使遠東帝國主義得以大售其陰謀毒計，他利用中國大資產者與大地主的反動性施展誘和反共的陰謀。因此，現在時局的一般特徵，是在光明的一邊，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流有了新的騰漲，但在黑暗的一邊，反民族民主的逆流也同時在大半個中國瘋狂激盪，這是新中國與舊中國交替過程中的歷史規律。環繞着這種規律，有兩條戰線在猛烈鬥爭着，一方面經過了四年之久以人民為主體的抗×統一戰線在艱難險阻中走向深入，走向羣衆化，但它的安定性一時還不能得到絕對保障；另一方面是在戰爭前夜失敗過的以日本爲主腦的反共統一戰線，面對着中國革命的主流，正在死灰復燃，曲折活動，但它的危險性還不能給予中國抗戰以致命打擊。前者是在鍛鍊和積聚更大的革命力量，造成中國抗戰的決定優勢，即是由穩定相持戰局準備轉入反攻局面，而後者是要削弱和破壞中國的抗戰建國力量，搗毀中國的反攻準備，即是由孤立抗戰最堅決的無產階級政黨來分裂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今天，中國人民面對着一個非常簡單明白的大問題：還是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到底，打擊投降、分裂與倒退的逆流勢力呢？還是放任反共統一戰線活動，以吞滅抗戰進步與團結的力量呢？這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使任何中間路線不可能存在。正因爲如此，中國人民大眾及其領導者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運用與先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在以前，統一戰線的結成，一般地不能不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那末，到了現在，統一戰線的發展就不能不着重自下而上的形式。如果

說，在先前，爲了鞏固初步的民族團結，特別強調統一與合作，在政治上對頑固勢力一般採取守勢（自然，對侵略者與漢奸則採取攻勢），那麼，到了現在，爲了防止和打擊侵略者、漢奸、親日派與一切頑固份子破壞中國的民族團結、國家統一與黨派合作，就必須在政治上對他們採取攻勢，（自然，對付侵略者、漢奸、親日派與其他頑固份子在策略上仍然是有分別的，同時政治的攻勢與軍事的攻勢也不能混爲一談），因爲只有政治的攻勢能够粉碎他們分裂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危險，因爲對他們無止境的退讓只有加重中國團結與抗戰的困難。如果說，在先前，特別強調各黨各派的互助互讓政策，極力爭取中國國民黨恢復民族革命大聯盟的精神，以求密切國共兩黨與其他黨派的合作，那麼，到了現在，爲了使互助互讓政策在更合理的狀態中推進，也爲了謀取整個民族統一戰線的安定，就不能不重視民族的自我批判與階級批判（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反動性），重視抗戰建國的競賽運動，重視鞏固抗×民主根據地的自衛政策，重視侵略者後方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與堅強。

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基本特點。用簡明的言詞表現出來！民族統一戰線在現今增高了其羣衆性、組織性、淘汰性與自下而上性，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統一戰線的領導力量特別加重，這是它的進步方面；但同時由日本策動由中國大資產者大地主參加的反共統一戰線已經成爲威脅中國民族最危險的逆流，抗×民族統一戰線遭到了空前危機。因此中國人民堅持統一戰線的第一

個重要任務，就是在與反共統一戰線艱苦的鬥爭中，堅持徹底抗戰、團結革命力量，推動民主進步，來打擊出賣抗戰、閹割抗戰、發動內戰、製造分裂與實行倒退的危機，擴大統一戰線自下而上的組織力量與戰鬥力量，批判、暴露和反對大資產者大地主的反共投降陰謀活動，截斷其與侵略國的聯絡線，不放棄一絲一毫的可能爭取時局好轉。

和上面一個總的特點密切相聯的，還有下面幾個特點。

在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部隊和民衆團體堅決執行了「變×後爲前線」、「×後重自衛參戰」的戰略，配合着和組織着×後的民衆自衛戰與游擊戰，在華北與華中創建了或發展了抗×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大半是由過去的淪陷區轉變而來的，是在日偽壓迫的間隙中生長起來的。它們和陝甘寧邊區同是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抗戰建國模範區域，並且取得了密切聯絡。本來，早在抗戰第一階段，大塊大塊的抗×民主根據地曾在日人後方由一角一隅的戰鬥產生出來，成爲整個防禦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只有到了抗戰第二階段，特別是最近，此等根據地才特別觸目地作爲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力支柱，而表現其對抗戰、團結與進步的決定影響。第一，由於日人把政治進攻提高到第一位，親日反共派在各地乘機猖獗，與侵略者相呼應，要保證民族統一戰線不致被突破，就必須發展強大的民衆自己的堡壘，在這堡壘中不僅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而且有堅固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與民衆運動力量，抗×民主根據

地在現階段恰恰起了這樣的堡壘作用；其次，由於日方側重於其後方的掃蕩戰，企圖由點與線的占領擴張為面的占領，並實行以戰養戰，對中國佈置了重疊的經濟封鎖線與經濟榨取圈，扶植了所謂「統一的」偽中央政權，與僑組織訂立了滅亡中國的「條約」，以奴化教育與愚民文化麻醉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因此，殖民地的命運在侵略者的刀光槍影中正威脅中國廣大地區。為要衝破這種威脅，就必須遏阻侵略者穩定和聯結後方占領區的活動，縮小其占領區，擴大其後方的裂口，抗×民主根據地正担负起了這種牽制的任務；第三，日方在現階段是要以全力來搗亂中國相持戰局的安定性，阻止中國的反攻準備，截斷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聯絡，而中國方面是要以全力穩定相持戰局，充分積蓄力量，聯繫後方前線與日後的抗戰力量，以便準備未來的戰略反攻；但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在×人後方擴大和鞏固民衆的抗戰力量，策應整個戰線的動作，來削弱、疲困和支解侵略者，最後配合全線的反攻來夾擊侵略者。抗×民主根據地的發展因此就成爲現在戰略相持和將來戰略反攻的有機組成部分。最後，與軍事一般的進展相反，在國內廣大區域裏氾濫了政治倒退文化倒退的狂潮，這對於抗戰團結與進步是一個嚴重威脅，要抵抗這狂潮，就必須有直接由民衆支持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即使是局部的存在，也有益於新中國的生長，因爲它能不斷擴大其對全國的影響，抗×民主根據地恰是民主主義的策源地。今天抗×民主根據地就在這些任務之下，成爲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模範區域。但爲什麼民族統一

戰線能够在這些區域特別順利發展呢？那是由於具備了下面幾個條件。首先，以工農為骨幹的民衆武裝抗戰力量正在一天天滋長起來，並且不斷由零散的戰鬥匯合為龐大隊伍的戰鬥。靠着政治教育、軍事訓練與戰鬥經驗的培植，這些武裝部隊的質素表現了極大進步，軍民合作關係表現了深廣發展。論新階段作者曾指出抗×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之一，是國共兩黨都有軍隊，現在這一特點更具體化而為下面的事實：在中共領導之下，建立了軍隊與軍民的統一戰線，在日人後方以工農為骨幹的民衆軍隊成為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支持力量。沒有這個力量，民族統一戰線就不易維持下去。

但僅有民衆自己的武裝力量還是不夠的，因為軍隊本身並不能直接解決民衆的政權問題與民生問題，因此在抗×民主根據地建立了民衆自己的民主政權。從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抗×民主政權不但擴張了它的範圍與影響，而且在中共新民主主義的領導之下，比前更高度地發揮了它的羣衆性、組織性與創造性。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今天還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但已部分的出現於抗×民主根據地（自然，在各個根據地表現得還不平衡），這是今日民主運動發展的一個值得指出的特徵。新民主主義政權在這些區域內執行了下列重要工作：（一）給予民衆以平等權利與基本自由；（二）推進抗戰建國的民衆運動，發揚羣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三）確立了民衆選舉制度，實行各種改善民生的政策（減租、減息、減蠶、減稅、增高工資等）；（四）實施廉

潔的民主法治，剷除貪污腐敗的政治；（五）建立抗戰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對侵略者佈置反經濟封鎖線；（六）幫助軍隊動員與兵役運動；（七）開展反封建反宗法的運動，給予婦女以解放機會；（八）打擊漢奸偽組織，肅清一切奸細；（九）發展反侵略反漢奸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與思想鬥爭，教育廣大民衆，堅定他們對抗戰建國的信心；（十）培養大批的抗建幹部；（十一）促進各階級各黨派的互助合作。顯然，如果沒有抗×民主政權，就不能發揚民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自下而上的民族統一戰線。

有了民衆自己的武裝與政權還不够，因爲要使武裝與政權適當地服務於民族與民衆，就需要正確的政治領導。中共在抗×民主根據地恰恰是抗戰民衆的先鋒隊和參謀部。在那些根據地，中共能够完全公開地直接地提出自己的政綱、政策與主張，能够與廣大民衆取得共同生活的聯繫，能够在羣衆中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能够敏捷地反映羣衆的生活與意見，能够大量地總結各種戰鬥的工作的實踐經驗，能够迅速地檢查自己的戰績與弱點，因此能够順利地鞏固他在戰鬥中的指導力量，擴大他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在抗×民主根據地，中共所擔負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第一，依照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鞏固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團結合作，使一切力量集中於抗戰，發起和加強統一戰綫機構；第二，在戰略上領導民衆武裝力量，進行艱苦的作戰，檢查戰鬥的業績、經驗與教訓；第三，推動和組織民衆自發的抗戰力量與

自衛力量，動員廣大民衆保衛民族，保衛抗×民主根據地，使與整個戰鬥序列取得密切配合；第四，在軍隊中建立堅強的政治工作制度，改善軍隊的質素，提高軍隊的戰鬥力量與士氣，保障部隊的鞏固與擴大，密切軍隊與民衆的關係；第五，領導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建立，改變腐敗的政治機構爲進步的民主機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幫助和健全民主政權與民主設施；第六，在統一戰線原則下改革和改良社會經濟、生產事業與民衆生活；第七，經過民主政治與民生改善，團結和組織廣大民衆，指導和配合各式各樣的民衆運動；第八，領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和發動反侵略、反漢奸、反封建、反頑固份子的思想鬥爭；第九，號召宣傳和教育民衆，激發民衆的愛國熱忱，提高民衆的政治覺悟與民族警覺，培養民衆的自治能力；第十，決定一切與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有關的政策與工作，並依照各地各時的具體環境與特殊條件把它們付諸實施。顯然，如果沒有中共在羣衆中間的政治領導與模範作用，就不能凝聚一切民衆的軍隊的戰鬥力量，鞏固和擴大抗×民主根據地，加強和發展民族統一戰線的堡壘。

正因爲有上述三個主要條件，所以作爲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民主根據地在現階段有了新的飛躍發展，這表現在：（一）由於在許多地方生長了新的游擊戰與民主政權，此等根據地在面積上大爲擴張（據約略估計，比抗戰第一階段，幾乎大了一倍）；（二）各個根據地取得了密切的聯繫，織成了捕捉侵略者與漢奸的廣大蛛網，特別是華北（黃河流域）與華中（江淮區）的抗×

民主根據地的打通，對於抗×統一戰線的發展有着決定意義；（三）此等根據地因着實力大為堅強，能够各自獨立應戰，成爲不可摧毀的民族民主革命堡壘；（四）此等根據地對於全國的政治影響與文化影響迅速擴大，引起了全國民衆的熱烈的同情、嚮往與擁護；（五）此等根據地的領導力量組織力量與武裝力量在全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抗戰建國工作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提高了在各階級各黨派間的發言權與左右全國的政治威信。

事實上，在抗×民主根據地，民族統一戰線表現了通暢的發展，這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出來：（一）在民主原則下，一切政治機構採取了「三三制」；（二）除漢奸托奸外，一切黨派與階級取得了平等的合法權利；（三）依據民主原則，成立了包括各階級各黨派的地方參議會；（四）中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執行了協助友黨與友軍的政策；（五）在民運工作中成立了各界的民衆團體（如工抗會、農抗會、青抗會、婦抗會、商抗會等）；（六）關於改善民生政策的執行以農工爲主體，但同時顧及其他革命階級的利益；（七）反對磨擦與分裂的原則不僥爲一般人共同擁護，而且爲上層份子所贊同；（八）在反磨擦鬥爭中，爭取了頑固派軍隊的士兵軍官的倒戈，瓦解了磨擦派的武裝力量；（九）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教育深入廣大羣衆。

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線在現階段發展的第二個重要特點。用簡明的言詞表徵出來，就是抗×統一戰線正在侵略者的後方特別觸目地生長起來，面對着反共投降倒退的嚴重逆流，抗×民主根據

地（包括×後的與西北的廣大區域）已經成爲中國革命主流中的高潮，在那裏，抗×民主政權、抗×武裝力量與工人政黨有了飛速的擴展，它們在不斷更新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因而這些根據地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比重與決定作用不斷增大，並且有力地打擊分裂投降與倒退的危險，成爲全國民族統一戰線的中流砥柱與模範區域。由於它們的發展，使統一戰線在全國的不平衡性更加顯著起來。因此，在現階段中國人民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二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擴大和鞏固抗×民主根據地，加強這些根據地的民主政權、武裝力量與革命政黨，增大抗×民主根據地在全面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與比重。

由於日人後方的抗×民主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有力的支撐點，但並非在一切區域內都是如此的。今天，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抗×民主根據地在全國所占的面積還相對地小，在淪陷區，是侵略者和漢奸的黑暗統治籠罩一切，在那裏公開組織着進攻中國的反共統一戰線，也就是策動着滅亡中國的統一戰線，這股黑暗逆流不能滲入以工農爲骨幹的抗×民主根據地，但却能曲折地影響許多爲中國頑固勢力統治的區域。在那裏，抗戰仍然在持續，然而削弱抗戰、分裂團結與阻礙進步的濁潮也在到處橫流，反共反革新的運動正在窒迫廣大民衆；有許多地方，已經公然提出了「反共」的口號，恢復了戰前「安內」而不「攘外」的黑暗狀態。因此，在全國有三種區域存在：一種是以工農人民大衆占優勢的自由民主區（即前述的抗×民

主根據地），那裏已經建立了並建立着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秩序，一種是以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占優勢的缺少自由的『自由區』，那裏正在加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權秩序，一種是由侵略者用屠刀獨占的奴化的淪陷區，那裏成立了殖民地化的奴隸主義秩序（即所謂「東亞新秩序」）。自然，這三個區域在空間上、力量上並非固定不變的，同時它們相互間的矛盾關係也不能混為一談。民主區的革命領導者與民衆是要聯合『自由區』共同打擊侵略者與漢奸及其盤踞的根據地，是要爭取『自由區』走向徹底抗戰加緊團結，實現民主，但自由區的黑暗勢力是頑固地拒絕和摧殘革新勢力與進步運動。因此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局面，就是進步勢力在日後發展，反而較之在『自由區』發展較為便利，更爲容易，因爲民主區的革命力量在軍略上主要是變×後爲前線，在政略上主要是變×僞奴化根據地爲抗×民主根據地，這種軍略與政略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成功。然而，在毗連民主區與淪陷區的地帶，有着頑固反共派的武裝力量與政治力量，在以全力阻止進步區向淪陷區伸張革命勢力，甚至與侵略者呼應，夾攻進步力量，這就使民主區經常要擔負起兩條戰線的戰鬥：一面打擊侵略者漢奸，一面抵抗頑固反共派。但對於抗×民主根據有利的是，並非整個非民主區與淪陷區反對進步勢力。首先，在無自由的自由區，也有兩部分勢力在猛烈鬥爭着，擁護抗戰、團結與進步的民衆與黨派的革命力量——沒有自由的自由解放力量——正在艱苦中潛滋暗漲，但傾向妥協分裂與倒退的逆流勢力也在竭力擴張；前者與民主區呼應聯絡，傳播抗

×民主根據地的影響，後者則兇猛反對進步區域，傳播侵略者及其侵占區的影響。民主的抗戰區能够與非民主的「自由區」聯合作戰，「自由區」的進步勢力的存在是一個極重要條件；沒有這一部分力量，民族統一戰線要在全國範圍內維持一天也是不可能的。同時還要指出，在侵略者統治的淪陷區中，也有抗×的進步的勢力在潛伏着，在默默地生長着，這種勢力的存在與滋長又是抗×民主根據地能够向淪陷區擴大影響和變淪陷區為抗戰區的重要條件。論持久戰的作者早在抗戰初期，就天才地指出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在現階段，這種情形特別深刻地反映在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過程中，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與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民族統一戰線不能不在犬牙交錯的狀態中生長。抗戰力量與侵略力量的對壘，團結力量與分裂力量的鬥爭和進步勢力與退步勢力的消長，在今天顯然有着最複雜的錯綜與結合。在抗戰陣營內部，存在着投降的、分裂的、倒退的份子，但他們又不是步伐完全一致的，他們之間有着各式各樣的矛盾，有的是親日派，德意路線派，有的是英美路線派，同時在他們之中還有各種政治派別紛爭着。在侵略陣營內，存在着反侵略戰爭同情中國抗戰的份子，在頑固派統治的區域內，存在着堅持徹底抗戰擁護團結進步的份子。同時，必須指出，在非民主的抗戰區域內，也可以分為種種不同的地帶，有的地方接受進步勢力與進步區域比較容易，有的地方（如毗連淪陷區與抗×民主根據地為頑固勢力統治的區域）特別黑暗，和侵略者與

偽組織有相當默契。

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線在現階段發展的第三個特點。用簡明的言詞表現出來，就是：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陣綫不僅要和侵略者及其公開傀儡作猛烈鬥爭，而且要和傾向投降、分裂與倒退的逆流作堅韌鬥爭，這各式各樣的鬥爭是在異常複雜的犬牙交錯的狀態中進行的。抗×民主根據地的革命力量和非民主區域與淪陷區的力量，正在分別地聯合地進攻和抵抗破壞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侵略者漢奸與頑固勢力，另一方面，侵略者及其侵占區和非民主區域內的頑固勢力也在分別進攻甚至聯合進攻中國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革命勢力。因此，民族統一戰線在現階段的第三個重要任務，就是匯合全國各方面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勢力，對自外而來的破壞力量與自內而生的反動力量作堅決有效的打擊，以克服分裂亡國的危險。

民族統一戰綫與反共統一戰綫固然是在犬牙交錯的狀態中進行鬥爭，但這種鬥爭又在由複雜而趨於簡單，這就是說，一方面，堅持民族民主革命的陣綫，正在不斷吸收和團聚一切現實的和可能的友軍，以擴大和鞏固抗戰、團結與進步的力量與組織，而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的內外逆流目前雖是發源自各方面，但在客觀上是匯合成為一股抗拒新中國生長的濁潮，威脅中國民族的解放前途，一切矛盾力量的複雜發展，遲早總會達到兩極化的境界，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辯證法。不管那些磨擦專家與倒退英雄如何堂皇地打着抗戰旗幟，但客觀上必然與露骨的民族叛徒合流

的。如果說，沒有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的和睦合作，就不能發動神聖的抗×戰爭，難道說，中共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飛躍進步成爲中國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今天，有人可以把他一脚踢開來單獨支持抗戰嗎？沒有疑問的，凡是用右腳踢共的「好漢」，他的左腳遲早難免陷在降日的泥坑中。蔣介石先生早就說過「反共」乃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這個真理就是在現在以至將來，也是不可動搖的。侵略者及其公開發揚其兇惡的「好漢」，他們就不用擔心中國抗戰，因爲他們知道得太清楚，反共、投降、滅亡乃是中國頑固派必然要唱的三部曲。他們在尋找反共統一戰線盟友的時候，不問被尋找的對象是否反日，只問他是否反共，不管他們是否親英美，只問他們是否反蘇聯。那些從抗戰營壘分化出來公開反共降日的「和平同志」固然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就是表面上打着抗×旗幟而骨子裏進行反共磨擦的「中國老爺」，他們也極端歡迎，即或不然，那些把反共看得次於抗戰的「民族英雄」，他們也決不吝惜，因爲他們很懂得，「民族英雄」一變而爲「反共英雄」，便不足畏。縱令開頭在政治天秤上是抗戰的法碼重於反共的法碼，但不久就會顛倒過來，最後索性兩邊的法碼併在一邊，拋棄抗戰，全力反共，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前途呢？石友三就可以作爲一個具體而微的答案。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反共的英雄不是和侵略者及其傀儡狼狽爲奸，就是和侵略者及其傀儡「肝膽相照」，否則他就不能有所作爲。說是，一面反共，一面抗×，或是先剷共而後抗×，就連鬼也不會相信。今天，反共的逆流不管發源於那一

方面，其最後的共同歸趨是沒有疑問的。自然，我們不能忘了相反的極端，即就是堅持抗戰團結與民主的革命洪流正在推動廣大人民，走向澈底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這條道路不但和對日投降的殖民地化的死路絕對相反，而且和聯帝「在興」的半殖民地的絕路截然不同，因為它的最後目的地是獨立自由的新中國，這是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道路，是民族民主革命澈底勝利的道路，指引全國人民走這條康莊大道的革命嚮導和頑固份子的作風剛剛相反，頑固份子是要全國降×或者親帝，而革命嚮導是要全國抗×同時聯蘇；頑固份子是要保留和加強封建的專制主義，而革命嚮導則要堅持和發展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頑固份子是要犧牲大眾的利益來供少數人禦策，而革命嚮導則是要犧牲少數人的享福來改善大眾生活；頑固份子是要破壞團結，進行反共內戰，而革命嚮導則是要反對內戰，加緊民族團結。如果說，目前有三條路線在進行猛烈鬥爭，——一條是抗×和共聯蘇的戰士路線，一條是降日、反共、仇蘇的娼妓路線，一條是親帝、反共、忌蘇的奴才路線，那末，前一條路線必然為全國絕大多數民衆堅持下去，成為中國革命的主流，而後兩條路線必然為少數頑固份子所擁抱，而匯合成為黑暗的逆流。堅持前一條路線的民衆是和擁護後兩條路線的份子作全力鬥爭，而後兩條路線的擁護者可以聯合起來反對前一條路線。今天，在事實上，已經開始顯露了這種兩極化的傾向，親日派與親英美派為着共同目的，是在聯合反共，企圖使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同盟軍陷於孤立與淪滅，親日派就可以實現「全面和

平」，而親英美派也就可以謀取「光榮和平」，（雖也不敢相信，親英美的頑固反共派有打到鴨綠江邊的決心），於是『各有千秋』，『各得其所』。但是反共的兩股逆流遇到了民衆的進步主流，不能達到目的，因為進步的主流在不斷增強其戰鬥力量，在不斷洗刷民族統一戰線。

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線在新階段的第四個重要特點。用簡明的言詞表現出來，革命人民及革命先鋒隊在與降日與聯帝兩條路線的艱苦鬥爭中，堅持民衆抗戰、民族團結與民主進步，這種二重戰線的鬥爭和前述的兩面戰線的鬥爭——民主根據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一面和侵略者漢奸鬥爭，一面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是密切相聯的，同時這種二重戰線的鬥爭愈徹底，愈尖銳化，則親日反共派與親英美頑固派的合流也就愈彰著，愈容易暴露。今天，雖有三條路線的鬥爭，但實質上可以簡化為兩種敵對的可能傾向鬥爭，一方面是以革命民衆為主體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由較小的區域向全國範圍擴展，使中國趨於徹底勝利，另一方面是以大資產者大地主爲主角的反革命內戰由局部向全面發展。誰戰勝誰，這是關係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第一等重要的問題。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第四個重要任務，就是加強反對降日與聯帝兩種傾向的二重戰鬥，並且利用它們相互間的矛盾來削弱與瓦解它們的勢力，暴露和打擊它們的合流，以便鞏固民族民主革命的統一陣地，增強民衆自己的戰鬥實力。

最後，必須特別指出，民族統一戰線今天不僅是在和侵略者漢奸的鬥爭中生長壯大，而且是

在反磨擦的不斷戰鬥中鍛鍊堅強的。大資產者與大地主爲要達到投降妥協和鞏固專政的目的，不能不以全力來加緊反共磨擦，親日派企圖經過反共內戰引起全國大分裂，然後實現其「全面和平」的賣國陰謀，而親英美派則企圖經過反共磨擦壓倒人民革命勢力，然後穩定其家天下的反動專政。在進行反共磨擦中，他們不僅運用政治武器，而且運用軍事、經濟、文化、思想的各種武器，動員一切力量來撲擊人民自覺的革命運動，來圍攻抗戰最堅決的革命政黨。爲了鞏固抗戰與民族統一戰線，爲了保衛抗×民主根據地，革命民衆與工人階級政黨不能不分出一部分力量進行反磨擦的艱苦鬥爭，這種鬥爭完全是自衛的，是被迫應戰的，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黨派與人民不能不在政治、軍事、文化、思想各方面回答頑固派的磨擦行爲與反動陰謀。雖然毫無疑義的，任何一次磨擦與反磨擦的鬥爭，不管勝負如何，總是減弱抗戰力量的，但是這種削弱抗戰的責任應當完全由反共磨擦專家來負。如果進步勢力一任頑固派肆意磨擦，絕不回擊，其結果必然是岳飛式的奉旨被誅，必然是抗戰力量的更加削弱，必然是民族團結的危機愈益加深。反之，反磨擦的鬥爭倘若戰勝了磨擦，可以使頑固份子知所斂跡，對進步勢力不敢再犯，即使不然，也可以使反共頑固派的磨擦資本大打折扣。倘使磨擦專家不把力量用來抗戰，而專門用來反共，這種力量遲早會變成侵略者賭博的本錢，那是完全沒有疑問的。在事實上，反磨擦的鬥爭雖然也有過損失，今後還可能遭遇重大損失，但是大體上它已經得到勝利，今後還必然繼續得到勝利。磨擦派

擁有龐大軍力與財力，霸佔各地政權，壟斷各地「輿論」，甚至可以得到侵略者的呼應，這些是有利的。但是他們也顯然有不利的地方，這就是他們違反民意，引起民衆反對；他們提出反共口號，就分明違背抗戰國策；他們內部矛盾太多，不能完全一致；他們營壘內的愛國份子會反對磨擦，必要時會發動倒戈；他們在政治上異常薄弱，不能有力地控制民衆；他們發動大規模的反共內戰，會引起國際間惡劣印象，特別會遭到同情中國抗戰的國家與人民的反對。因此，頑固派在進行磨擦時，即令能够得一時的偶然的勝利，但從整個革命條件來估計，他們的反共行爲無異自殺。在反磨擦的陣綫方面，也就是在抗×統一戰綫方面，儘管有許多不利的地方，然而克服這些不利因素的有利形勢是存在的。在本文結尾，將詳細分析克服民族統一戰綫危機的各種歷史條件。在這裏，只是要指明，反磨擦的鬥爭是異常艱苦的，然而却是可以日趨有利的，因此無須爲統一戰綫的前途抱過分的悲觀。自然，誰也不能忽視民族統一戰綫的一個重大弱點，即反磨擦的鬥爭在今天發展還是異常不平衡的，在頑固份子統治的黑暗區域裏，在侵略者獨占的奴化區域裏，現在還不能展開公開的大規模的反內戰運動，頑固份子慣用各個擊破的手段來切斷進步勢力的聯繫，打擊進步勢力較爲薄弱的地方。因此，反磨擦的鬥爭今後還要經過更艱苦更嚴重的戰鬥。頑固份子的磨擦正如瘡疾在人體內的搗亂，有時令人寒熱交作，有時又略爲鬆弛。反磨擦的陣綫就要加倍提高警覺性，戒備頑固份子的大舉進攻，以便在磨擦逆流狂行的時候，對頑固份

子作決定的打擊，特別要戒備其各個擊破的戰法。同時必須指出，反磨擦內戰的鬥爭是與整個抗戰革命分不開的，在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不能一分鐘鬆懈與了最大的民族××戰鬥。頑固派在與進步勢力磨擦時，必然要放棄對×作戰，甚至與××取得諒解與默契，但進步勢力却應該而且能够在反磨擦戰鬥中，同時與侵略者作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向全國人民與國際大眾證明，誰是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集團，誰是投降分裂與倒退的罪魁，也才能暴露反共頑固份子的全部罪惡。

這就是民族統一戰綫新形勢的第五個重要特點。用簡明的言詞表現出來，現階段的民族統一戰綫是在空前艱苦的反磨擦內戰的鬥爭中生長出來的，反磨擦的鬥爭今天已經成爲整個民族抗戰與革命運動的一環，不能加強這一環，就無法鞏固統一戰綫，也就無法克服民族危機，爭取民族勝利。而反磨擦的鬥爭又不是一下子可以決定勝負的，它必須經過更嚴重的戰鬥，取得全國人民反內戰運動的配合，才能制止頑固份子的狂妄。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五個重要任務，是在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的總的陣綫上，加緊反對內戰反對磨擦的鬥爭，一方面孤立頑固反共派，一方面爭取一切現實的與可能的友軍，並且對於頑固派要特別提高革命的警覺性，把反磨擦鬥爭配合着抗戰革命的進程來推進。

作者附識：本文寫於皖南事變以前，因此有些地方說得不够，本文排好後，無法修改，又不能多所增刪。下半部當重加修改，再請本刊編者審查發表。不過，就這一部分已經發表的文字內容來說，自信尙未過時，或者可略供讀者諸君研究目前國內時局參攷。

日人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認識

石濱知行

本文原題爲中國民族運動與英美蘇的關係，載於改造第二十二卷第二十號。作者石濱知行係日本有名中國通。他在本文從歷史上以客觀的態度指出中國民族運動的特徵：第一是中國民族運動起來時，已印上了各帝國主義侵略的烙印，因之，它的主要目標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與剷除落後的封建勢力；第二是祇有在國共合作時，才使民族運動有飛躍的進展；第三是祇有在開展民衆運動時，才能把民族運動的落後性克服過來。以上不僅有着他可欽佩的正確性，同時，使國人更應有所奮勉。特別是本文最後結論，認爲中國宿命的抗日統一戰線之不易破壞，使日人對於『中國事變』的前途，表示悲觀，這點更使國人除興奮以外還須警惕。爲此，特譯出以供國人參考，並以自警！至譯文除刪除一二處外，都照原文直譯，以存其真。當然我們還有對於作者某些部份的意見，表示不能贊同的地方。——譯者

一 中國民族運動的諸特徵

英美合作交涉，英美澳三國會談，關於越南的日法協定的成立，英軍在達卡爾的敗北，德國

連續的轟炸英倫三島，美國對日禁運鐵銅，美國對華五千萬借款的供與，日德義三國同盟的締結，英國的開放緬甸公路，美國的撤回遠東美僑，英國的撤去在華軍隊，加拿大的禁運鉛、鋁（美除外）等等，在這幾星期繼續起來的諸事實，正使人迫切感到已在世界危機的前夜。貫通這危機的赤線，一方是英美的合作，另一方是日、德、義三國的同盟，由這兩集團形成世界尖銳的對立。同時，由這世界的對立形勢之形成，使局限在東洋·歐洲各方面的紛爭，已擴展至成爲世界的規模。德國對英制霸戰，早已不成單純的德英戰爭，同樣，中日戰爭亦早已不是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就是說各處的戰爭，已被融化在世界變局中。還有，這一世界變局，除了兩大集團以外，由於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而且與其他國家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的蘇聯的存在。給予這一變局將來的發展以極大的擴大性與複雜性，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這種世界變局中佔重要中心之一的中日戰事，今後的動向究將怎樣呢？爲解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中國民族運動的觀點出發，加以考察吧。

中國民族運動，若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三十年歷史。但它之成爲意識性的、組織性的運動，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才是劃時代的運動吧。作爲民族運動之目的，爲建立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爲達成這種目的所採取的主要指標，第一，對外的爲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對內的爲剷除軍閥與封建制度。這一民族運動的目的與指標；到今日

爲止，仍舊始終如一。當然，其手段與動向等，由於客觀條件與政治主體的性質之不同，到今日爲止，不免相當曲折。

中國民族運動若從歷史方面看來，其與別的先進諸國的民族運動所不同的最大特質，係後者發生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勃興期，前者則由於歷史事情的限制，祇有發榮滋長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成熟期。因此之故，當中國掀起強有力的民族運動時，在中國國土上已印上了列強帝國主義的烙印，這不僅威脅了國家的獨立性，（領土、租借地、租界、治外法權、關稅、鹽稅的管理、中國財政之國際與共同管理論、通過軍閥干與中央政治等等），同時且阻礙了中國民族經濟之從封建桎梏解脫出來。這就是中國爲求獨立自由，其對象比起建立國內體制來，首先還是在打倒帝國主義這一民族運動。中國民族運動特有的口號——「抗戰建國」或「抗戰建國並行」就是從這裏產生。因之，中國的民族運動，根本就以反帝運動爲其主要手段，這可以從鴉片戰爭以後，太平天國戰爭這一反吋的排外運動起，通過長期民族運動的歷史一直到今日爲止的接連的排外運動作爲有力的證明。

中國民族運動後進性之又一特徵，爲世界資本主義成熟期以後最有力的，作爲歷史之條件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生，與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之現實地顯呈於目前。它以中國民族運動主要指標的反帝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向世界呼喚。因此，以後的中國民族運動，或是公開，或是潛行，與

共產主義運動有着緊密的關係。不僅如此，在某一時期，爲使民族運動發展，反而不得不依靠這一力量。國共合作，就是一個適例。

二、十月革命給予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

第一次歐洲大戰中，列強對於中國之經濟的壓力，減鬆不少，因之，使中國資本主義顯示若干的發展。紡織、麵粉，製絲及其他民族工業開始抬頭，民族銀行的資本總額，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二〇年比較，爲三百四十萬元與五千六百四十萬元，計激增至十七倍左右。

然而這種戰後的發展，祇限於二三部門輕工業的繁榮，關於重工業部門，依然表現不出自主的發展，就是說，它不得不依存於外國，從而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有它獨立的強大的階級力量，亦就是說它不能脫離買辦性與封建性。從政治方面說，它缺乏像法國那種樹立打破封建資本制的力量。稍得抬頭的資本家，因隸屬或被分割於各列強互相敵對的資本，要合成一種巨大的力量，當然有所不可能。因之，中國甚至在資本主義化最好的時機，亦不能完成它應有的發展。等到恢復和平後，列強當然又有力量回轉到中國來，則其可能性之愈趨減弱，自是必然趨勢。

一方面，列強在華的企業與其促進的民族工業之發展，使中國勞動階級亦隨之而增加起來。然而他們在這種中國經濟的階段中，「不能不受到三重的剝削，——即帝國主義的剝削，資產

階級的剝削，以及半封建的剝削」。中國人民既然特別受到激烈的壓迫，其生活又特別困苦，則他們要求解放之心，自然最感迫切，不待說，同時且使他們最易感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最易使他們團結一起，從事鬥爭，而且在鬥爭中特別表示他勇敢、決斷與猛烈的精神」（石川正義：近支那民族運動史一六〇頁、一六一頁）。

俄國革命終於告成。沙皇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聲明無條件取消，其他一切特權亦表示放棄，同時並發表援助中國民族運動。十月革命給予中國民族運動的影響，可謂大極。這在後期孫中山先生的言行上亦表現得很明顯。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當場通過對於山中先生所領導的民族運動，以黨外合作的形式，給予充分的援助。又同年由蘇聯所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國民黨亦派遣代表出席。同年有馬林與孫中山的會見，翌年一九二二年越飛之來朝，就有越飛與孫中山協定之締結。在這些人援助之下，國民黨於是實行改組，並宣言道：

「我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至中國國民黨，自秘密團體至成爲公開的政黨，其經過歷史，有二十年，其奮鬥的生涯，可謂大極。……然綜合十數年來成績，不得不自認失敗。……若欲挽救貧困剝削疾病中的中國現狀，必須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的政治團體，根據歷史的使奮，與民衆的熱望，來領導它，並爲此而奮鬥，使其達到所抱持的政治目的。」（一九

一三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這裏依照日文翻譯，因遍查手邊中山叢書無此宣言。——譯者）改組結果，委員九人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就被組織起來，同時鮑羅廷被聘為顧問。

一九二四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東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有改組案、新政綱、宣言、國民政府組織法等都給通過。又在以前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亦會參加，於一全大會共產黨員得被正式決定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於是實現。在該大會宣言上，最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句子。即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中山叢書，第四冊，歷年政治宣言二八頁）。

又一全大會中山先生關於中國國民黨宣言趣旨的講演中有這末一段：

「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要有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

，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中山叢書第三冊、第三輯、一一三頁上）。

又在政黨的精神在黨員全體的演說中，中山先生對於列寧的死表示悼意說：

「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爲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一全大會）之目的亦是在此」。 (中山叢書第三冊、第三輯、一一三頁)。

從上述的言行看來，黨改組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一九二三——二四年），中國的民族運動，很顯著的與共產主義非常接近。

更又，「當時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熱情，可謂已達沸點，他在與蔣的信中說——今日的革命必須學習蘇聯。我黨今後的革命，若不師事蘇聯，就不能有所成就吧——孫中山先生認爲中國革命必須是蘇聯式的革命，同時並認爲妥協分子的加入，對於革命絕對有妨礙，因此不允許他們加入」（石川正義：近代支那民族運動史，一九三頁）。又我們讀有名的孫中山遺囑，及其臨終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遺書，不難理解當時中山先生的革命情緒及受其領導的民族運動的性質。在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遺書中，他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桎梏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志）合力共作。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次予我國之援助」（中山叢書第四冊、歷年書牘函電五四頁）。

三 國共合作與中國民族運動的躍進

我們更從中山先生的忠實友人，同時與其繼承者共事甚久，對於中國民族運動有相當認識的德國人庫斯塔夫、阿孟所著孫文的遺囑一書來加以考察吧。從阿孟的著作中，很明顯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而且祇有這種關係，才顯出中國民族運動的特質。現在由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正是測知發展至成爲世界規模的中日事變下的中國動向的一種重要關鍵。茲從日譯「現代支那史（孫文遺囑）」摘錄如下：

「彼時又一亞洲國民在革命過程中，把資本主義國民對於他國的權力意志完全捨去。俄國人之蹶起，使中國人看到這種事實認爲足資學習。精神的變化，正是這種準備的開始。

（第一卷五四頁）

「這已成爲目前根深的國民精神。孫文就是這精神的領導者。（第三卷、五五頁）

「俄國人與中國人的投機，不僅是一個政治的策謀。更強烈的共同利益聯結了中國與蘇聯。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生活法則的權力意志之共同的反對，使兩國趨於結合（五七頁）。

「但把民衆導向共產主義目標，在孫文的計劃中是沒有的。孫文不喜爲革命而革命」（一二四頁）。

「孫文把資產階級、農民、工人等全國民統一於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中，同時使結成戰線，以保守自己的文化，並從西歐擷取它的特長，使給予所有階級以充分的福祉，乃至盡量的找尋足資民衆發展的東西。」然而「中國不能從西歐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要求到對外戰線的強化，那是非常明顯的。又民主主義已使武力與財力提高至能施行完全的專制支配。……這使孫文不能不改取布爾塞維克的方法，即爲了計劃地實現三民主義的國家說，不能不組織無產大衆作爲它的基礎的方法」（一二六頁）。「鮑羅廷及其他代表，爲了孫文的大事業會建樹了許多大功績。而且他們輸入了各種方法」（一三一頁）。

最後阿孟的結論是這樣的：

「孫文始終尊重現存的家族制度。他並始終主張維持宗教的——儒教的國策。爲了國家建設，他的確求取蘇聯式的、形式的——組織的方法。他爲達到這個目的，主張排斥資本主

義，並使生產手段及交通工具成爲蘇聯式的社會化，並改造地上之財富爲民衆之財富。最後在政治關係上要求與蘇聯同盟。雖是如此，然而他對於蘇聯共產主義的進路，根本是反對的。他不承認中國社會像蘇聯那樣可以根據共產主義同樣原則從內部加以改造」（第四卷、四五頁）。

但與上述同樣值得銘記的是下述國民精神的動向。

「儒教精神的確繼續存在於國民的風習中。儒教的倫理與道德的滲入生活中，是我們所切望的。但這種精神的反抗，（由於俄國革命的刺激，使中國國民精神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已使中國國民成爲一種主體，這，正予這種反抗以不可抗的壓力，同時，從這種壓力中，使產生種種事件」。（第一卷、五六頁）

一九二〇年中山先生驅逐廣西派，復歸廣東，改組軍政府，樹立廣東政府，更又把實行苦迭打的陳炯明驅逐出廣東而設置大元帥府，並以廣東爲現代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根據地，這實在是在受俄國革命的刺激所造成的民族運動的力量之賜。接着國民黨之實行改組，以奠定今日國民黨發展之基礎的，亦受這種澎湃的民族運動的壓力之賜。又北伐告成，上海進擊，以及武漢政府成立，亦是受國共合作的民族運動之賜。至如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五卅事件的掀起，以及接踪而來的六月十一日的漢口事件，六月十九日的香港大罷工，六月二十三日沙基的事件……這些反帝運動

，大部份亦受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以上特別是依靠共產黨之動員民衆——工農運動之力量。總之，作爲國共合作的民族運動之成果的廣東政府的成立，北伐的成功，武漢政府的成立等，一切都是今日中國民族運動或國民政府的基礎，那是不會錯的。同時它又是中國民族運動的特質。關於這，即使觀察以後的民族運動時，亦不允忽視。

四 反共聯帝後中國民族運動的低落

國民革命軍進至江浙一帶以後，反共旗幟立刻就被明顯地揭露出來了。首先從上海開始苦迭打，接着在各地的國民黨實施清黨運動彈壓共產主義團體，禁止民衆運動，追放鮑羅廷等俄國顧問。這樣，若借用前記阿孟的話，「新生的國家，孫文的世界，再又化爲廢墟了」。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國民黨政權一方面通過宋子文與國內民族資本締結和平協約，即從他們獲得資金的融通。「當國民政府奠都南京，進行各種國內統一工作最必要而感缺乏的，當是財源。因之，國府惟有發行國內公債之一途。關於發行這種公債，國民政府採取與從前中國政府不同的方式，它首先着目於上海地方的銀行家，即所謂浙江財閥；國府盡力拉這些銀行家財閥使參加公債計劃，關於這點，因運用得法，大告成功。……當時國民政府公債以極低價格出賣，普通利益當在二成以上。上海銀行之能買入這種高率利益的公債，祇要國民政府能繼續存在，當然是最好

的投資方法。各銀行爲要獲得這種高利，在繼續不斷地收買公債之間，不管國民政府是怎樣一個政府，勢非加以擁護或支持不可」（吉田政治：最近支那通貨事情，三——四頁）。同時以同樣手段借貸民族資本（山上金男、浙江財閥論，一四二頁），以至進而實施銀行改革、通貨改革、這從政府方面看來，正是依賴於民族資本；而從資本方面看來，從獲利性這點出發，不能不擁護國民政府。一句話，國民政府根本建築在這些民族資本基礎上面。

同時在對外的方面，它首先獲得英美兩國的承認。特別是由於英國的援助。即在幣制改革上，它獲得英國的援助，在白銀協定和其他借款上，它獲得美國的幫助。這樣，對外的關係，這一政權主要是受英美的支持。

具有這種性格的政權，其嫌惡反帝國主義與嫌惡工農主義的民族運動，自是必然的趨勢。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有二條規定，是值得注意的。即

一、國民大眾的指揮與領導，將來應歸國民黨保持。

二、國民政府對於蘇聯的親善關係，應有一個限度。

前者顯然禁止民衆自動的民衆運動，這意思是說民族運動官僚化；後者顯然極度警戒與蘇聯接近。這樣，民族運動完全使「孫文的世界化爲廢墟」，政治的發展，已從高潮的激浪，再回到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淺隘的運河中」，所謂「民主主義，已完全成爲被限定的德謨克拉

西」(阿孟、現代支那史、第二卷、五四——五五頁)。

當然，之後國民政府不僅放棄國共合作，且進一步積極從事討伐中國共產黨的壯舉。這就是所謂『農民戰爭』，是勦共、是掃匪戰。

國共兩黨，跟着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來的中國情勢的緊迫，又表示要求接近。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更進一步的促進兩黨合作動向。西安事變的真相，現在雖尚不能明瞭，但中國共產黨自「滿洲事變」以來主張締結抗日聯合陣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的抗日救國宣言，同年第三國際的中國問題決議案，統一戰線的結成，各界救國聯合會大團結等之由下而上的要求，使國民政府在客觀的危機下，不得不表示屈服。而且由下而上的愛國運動的中心力量，不待說是中國共產黨所表現的助力，這是不能抹煞的。這結果，竟使「事變」爆發以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同時二十三日蔣介石發表接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並宣言「放棄異見，一致赴難」，這裏，蔣介石政權祇有與共產黨握手，決意合作，才能共同抗戰。這依據毛澤東的說法，唯有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結成，才是今日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骨幹。

總之，我們通觀過去中國民族運動歷史，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中國當感到有實現民族的事業的必要時，一定是國共兩黨的緊密合作。作為國民政府成立之基礎的廣東政府、武漢政府之所

以能成立，北伐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在於孫中山先生的國共合作。中日事變起來後，其所以能結成統一戰線誓與日本斡旋到底，完全在於蔣介石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樣說來，上述的情形才是中國歷史所具有的特殊性質，那是最明顯也沒有了。

五 支持抗戰的二種力量

中國的抗戰，完全依靠三種力量被繼續着。其一爲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各部門的建設所由來的力量。即，從政治方面說，是中央政權的樹立，軍閥的整理等中央化運動之進展，關稅自主權及租界收回等之部分的權益的收還，新法制的制定，各種政治機構的建設；從經濟方面說，爲財政建設、銀行改組、以及從廢兩改元起至幣制改革止的貨幣改革，各種經濟建設；從軍事方面說，由於裁兵、雜軍整理而使中央軍編成強化等。上述諸項，正是民族資本及其階級所演的極大節目，事變以後的今日，因迫於必要，使情形更加向前進展。就中特別是割據的軍閥之解體，由於國共合作而使國內摩擦的減少、邊疆地方的中央化，民族團結的促進，中央集權的鞏固、內地經濟建設事業的愈趨發展，以及各種經濟統制、自給自足政策、軍事建設（民國戰時軍律、兵役法、戰時徵募新兵接收辦法、徵集國民兵令、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等的頒佈）等，值得我們注意。又作爲抗戰力的各種建設事業所具有的力量，若估計過低，當然也是

一種錯誤。因為資本不足，技術未發達和重工業缺乏等，在某程度，正可動員民衆，利用地大物博以補其不足，這點我們必須了解。但同時另一方面對於各種建設，無論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從國民政府樹立以來，受英美的支持與援助不少，這亦是一個事實。

第二種力量爲國民政府自始受其支持的英美等民主主義國家的援助。中國的建設事業，其依賴於各強國之處極大，已如上述，至「事變」後英、美、法諸國以自國利益出發，對華作經濟的、外交的及道義上的援助，這裏實無重複說述之必要。這祇要看最近英國之開放緬甸公路，美國之對日禁運，以及對華五、〇〇〇萬金元借款等就能了解。國民政府與英美親密的結合，不失爲中國目前民族運動的重要因數之一。然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以解放爲目的的民族運動的援助，正如張伯倫在議會所公佈，不外以帝國主義的利益爲中心，換句話說，在本質上是含有反對中國解放之意義的，這點我們亦不應忽視。所以「美國的援助中國，根本是壓迫中國。美國主義之援助中國，不僅沒有損失一錢，除了迫使購賣武器以外，同時且從中國運去大量的白銀，藉以增大對美的依賴性」（三宅邦男譯第二次大戰的性格二七三頁）。

抗戰持久的第三種力量，爲國共合作之結果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與蘇聯對華的援助。共產黨之積極參加以蔣介石爲中心的抗日戰線，與加強民衆組織力動員力，這一力量，是非常偉大的。蘇聯的援華工作，因爲要顧慮到有招來孤立自己與妨礙民主國家援華工作，所以不敢怎樣公開發

表。但事變前的中蘇協定，一九三八年的一億金元對華貿易借款，以及李宏略所指出而未經發表的借款，一九三九年的中蘇通商協定，至少已達八千萬羅布的對華武器供給等以外，尙有利用「滿洲」國境的對日牽制與西北公路的利用等許多無形的助力，亦應加以注意。

總之，國民政府對外固有的支持者英、美、法等「民主國」，與通過共產黨的蘇聯的援助，對內因受國共合作而從兩方面得到物資的、精神的助力，才使它有難以擊破的抗戰力。

六 再會吧，東亞新秩序！

國共合作依然在繼續中。這兩黨本質上的性質完全不同，即在目前，關於民族運動最終目的，亦不能一致。例如毛澤東對於國民黨有些人所要樹立的民主主義，認爲從其目的看來，不過是歐美式的舊民主主義。所謂新民主主義，「絕不是過去歐美流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主義，同時，亦不是最新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義是中國各民族運動階級（工人、農民、智識份子、中產者）的民主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十一月十二日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結果以「交通不便」爲理由而被延期，實際上或許因爲關於憲法上民主主義的解釋，兩黨意見各不相同，還有所期待吧。

然而今後祇要繼續抗戰，兩黨必將設法避免分裂，繼續合作。

現在，中國民族運動，依然是國民黨站在領導地位，統制着共產黨。但在國民黨所採用的各種辦法中，例如遊擊戰、長期戰略之類，是完全受共產黨的影響的。特別是戰爭若更形長期化，則中國從南方不能獲得英美物資援助，西南方又受日本軍的威脅，因而它的建設不能不移向西北方時，那就毫無問題更加促使中國接近蘇聯。不僅如此，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爲了繼續長期抗戰，不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使民衆組織化，並把他們動員起來，當是當前重大的問題。關於這一工作，在中國能捉住工農大衆心臟的共產黨，當然是主要的力量。

「中國落後的經濟階段，與相應的技術的低下，若沒有外國技術的援助，要它獨立地創造國內軍需品生產力，那是全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對於急速創造國內軍需生產力之舉，事實上若是不可能的話，那爲彌補這戰時體制的弱點，除了再進一步加強民衆動員以外，恐再無其他方法。所以縱使從內地經濟建設所碰到的各種困難看來，中國戰事體制的客觀要求，祇有面對着民衆動員澈底化的方向前進。站在抗戰中國指導地位的二大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方面繼續維持合作，一方面擬怎樣來答復客觀要求，凡此，正是決定抗戰中國將來運命的基本問題。同時這一過程，在客觀上，國民黨一定表現爲一方面保持它那黨的組織，另一方面則使自己起左傾的變質的過程；從共產黨方面看來，則表現爲以客觀的要求爲背景，使國民黨組織下的民衆拉到自己方面來的過程。」（滿鐵調查課支那經濟年報昭和十五年）

版四五一——二頁)

這種傾向，與中國民族運動過去歷史合起來加以考察，那企圖實現「東亞新秩序」的日本，對於今後日本對華政策上，就不能不加以充分注意與考慮。以爲日德義同盟既已告成，蘇聯援華工作當將立刻停止，或是爲了同盟國的關係，通過德蘇協定蘇聯當可回頭來援助日本，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幼稚。

其實今日的中日戰爭，已擴大至成爲世界的規模，其前途亦隨而複雜化起來。中國由於國共合作，巧妙地利用複雜而錯綜的國際關係，即一方面對英美，他方面對蘇聯，使積極援助中國與牽制日本。特別是從中國社會的特質，即從中國社會所產生的中國民族運動所具有的特質，「中國國民爲主體」的反帝的反抗性，以及現在正在變質過程中地方看來，正如民族運動史之所示，中國與蘇聯的密切的關係，與過去的比較起來，今後的情形格外值得我們重視。

還有，不論是蘇聯，對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的建立，在本質上當然是反對的。因此，常有把中國作爲緩衝地帶並放在自己身邊的必要。蘇聯很早就豫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必然爆發及繼之而起的是反蘇聯反共的世界戰爭。其豫言之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今日已成爲事實，因之，目前的蘇聯，已在作反對進攻自己與反共鬥爭的準備。這時候，我們切不可忘記中國是一個有力的因子。

總之，這次中日戰爭，在世界化的動亂中，其前途是不允許我們樂觀的。再幾個月當可把事變結束吧，這種毫無根據的自慰的浮說，應該決然加以排棄。面對着目前困難時局，我們應捉住它的本質，以求解決，實爲首圖。

論 中 國 化

方 舟

一

我是中國人，自然愛中國。

不過我愛的是新中國，不是舊中國。有些人却愛舊中國，不愛新中國。愛舊中國的人，希望舊中國長久存在下去。但是舊中國早在崩潰之中，現在就差沒有完全崩潰。愛新中國的人，自然希望新中國急速成長起來。事實上，新中國是在急速成長起來。

這新中國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或文化方面，都有他的新面目。現在單說文化方面。新中國的文化人，近來提出了「中國化」的口號。這個簡單，響亮而含義深刻的口號，是一般中國人，特別和文化事業有關的人，都應該十分明白的。

二

「中國化」口號的提出，首先表示着新中國的基礎已經立定了。因為舊中國決不會提出這口

號，新中國的基礎沒有立定時，似乎也提不出這口號來。爲什麼呢？這要引證一點近些年來的我國文化運動史，才會明白。

我國有很古的文化，並且比周圍鄰國民族的文化都高，所以自稱天國，一向不把異族文化看在眼裏。就算給異族侵進來了，日後也多給我國的文化同化了。國人每以此自豪。

但是正在我們自豪自大的時候，西歐資本主義的文化，却遠遠地超過了我們。文化這東西，有如水向低流，總要向低處侵進的。清朝因此採取了閉關自守的政策。可是終給人用洋槍洋砲打進來了。

人是勢利眼的。既然給人家打進來了，就無論如何頑固，也得承認人家的優勝。不過還以爲優勝的，只是洋槍洋砲之類的物質文明。於是有所謂，「洋務運動」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提出來。

洋務運動是什麼？

「洋務運動是開明官吏的自強運動，結果只是建設了一點軍用工業，如船廠，砲廠，礦業等。他們的信條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他們一方面受着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的洗禮，拿孔孟學說，當做不變的大道理，所以他們主張「中學爲體」，他方面他們又因爲受着內外的壓迫，受着極大的創痛，不得不驚懼夷人的本領，所以他們又主張「西學爲用」。這不

是爲了新中國的前途，而只是爲了挽救舊中國的危機，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不是進步的，而是保守的。」（何幹之，三民主義研究，傍點由筆者所加）。

還有，一切復古守舊的思想和行動，當然是要保存封建的舊中國，就是維新運動，也還是爲的保存舊中國。可是腐敗的舊中國，在列強環攻之下，是無論如何站不住腳的。尤其甲午之役，竟被一個小小的日本打败了，這個老大的舊中國，從此紙老虎戳穿，不再給人瞧得起了。中國人自己也完全失了民族自信力。侵略者的魔手，也因此更加兇險，把個中國緊緊扼住，使他不能翻身。在這樣的情形下，國人的文化思想上，就有着如下的大變化：最初是自豪自大。其次是承認物質文明是西洋的好，精神文明還不及中國，外科開刀要請西醫，內科毛病還是中醫。到後來則覺得外國樣樣好，中國一樣也不好。外國不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也高出於中國。西醫不但是外科，內科也是很好的。中醫完全不科學。中裝也不合衛生，穿着不顯精神。中國貨簡直是劣等貨的代名詞。中國文字也野蠻。中國音樂太單調。中國畫沒有意境，也單調。中國詩詞太刻板。中國線裝書看着令人離開現實。中國人也糟，什麼在外國很好的事情，一到中國人手裏就流弊百出。因此，崇拜外國，醉心西化。但是在崇拜外國，醉心西化之中，又有兩種全然的傾向。一種是從愛中國出發。因爲愛中國，所以看到中國各方面都不行，非常痛心，看到外國各方面有好東西，所以非常羨慕，很想多多學過來，把中國弄得好些。這種人爲了打倒舊中國的封建保守的

傳統思想，不免矯枉過正的輕視了中國民族文化遺產的優秀成份，甚至忽視了大眾生活的習慣和風尚。這在五四文化運動中表現得頗明白。然而他們的急於「歐化」，却爲的改造中國，所以矯枉過正一點也是可以原諒的。可是第二種的傾向就不行了。這是由於中國着着失敗，對中國失了民族自信心而發生的。這種傾向最多表現在西蔥，買辦，買辦資本家，以及其他和洋人有關的高等華人，知識分子等等人身上。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生活上都依附着外力，因而至於懼外媚外，完全看不起自己。這在文化上表現出來的是「全盤西化論」。在「全盤西化」的口號下，不是很可看出他們的心目中已經完全沒有中國了嗎？

所以復古守舊以至中體西用的文化運動，是要挽救沒落中的舊中國；全盤西化則是舊中國淪落爲殖民地的奴性文化的口號。二者都非中國之福。因爲已經舊了的，理應讓它快死。因爲舊的不死，新的就無從成長，怎麼要苦苦守住它呢？又中國自有中國特殊的情形，怎麼可以全盤西化呢？外國東西無論怎麼好，也只能把它中國化過來。可是「中國化」，決不是失了民族自信力的人喊得出來的。

又在一個政治文化逆流的時期，有些教授們提出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口號來。稽文甫先生稱它爲「第三種文化」，或「中國化運動」的預兆（見他的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理論與現實第四期），我以爲是不對的。試問他們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本位」是什麼？這只要看當時

的政治和文化都在逆流中，新中國的革命勢力則是分散着，潛藏着，苦鬥着，提倡中國本位文化的教授們，正和這種革命勢力作對着，所以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本位，當然是舊中國的本位，他們的文化運動自然也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不是進步的，而是保守的。

然而政治，文化上的逆流和保守，只有更便利於外力的侵入。到了「九一八」，東北就輕輕的丟失了。不久，侵略者又如踏入無人之境似的侵進關內和長城來了。於是全國譁然！愛國人民和各黨各派，紛紛起來要求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共同救亡。到了七七戰爭，八一三戰爭，中國就全面進入民族解放戰爭了。在戰爭之初，狄人揚言三個月就可把我們屈服，外國人也多不信我們能支持多久，我們自己，除了一些有遠見的人們以外，也多担心中着失敗。直到抗戰進入第二階段，無論在軍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能立得住腳之後，才大大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這時候，新的中國可說是完全打定基礎了。就在這樣的前後，有些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中國化」的口號。有幾位朋友討論了一次水滸，我問其中的一位，有什麼結論，他笑着說，水滸很中國化。我不知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水滸是道地的中國貨，有什麼中國化不中國化呢？擁護舊中國文化的人，無所謂中國化不中國化，也與此相同。中國化是正在成長起來的新中國的呼號，因為新中國必須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是外國的文化，如同我們對於食物，必須經過自己的咀嚼和消化之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作為自己的營養分一樣，

也必須經過中國化之後，才能作為新中國自己的文化。所以中國化是新中國文化的標誌。

三

其次，「中國化」口號的提出，表示着人民大眾的力量抬頭。這只要和上節說的許多舊中國文化的口號比較一下就可明白了。譬如一切復古守舊的文化思想和行動，都以舊中國為立場，以舊中國的封建地主（皇帝也是一個最大的地主），官僚，士大夫等少數特權階級為立場。洋務運動者的「中體西用論」，也以舊「中」國為主「體」，決不以人民大眾為主體。就是物質文明的「西用」，也用不到大眾身上去。是在五四以後科學和玄學大論戰的時候，據說玄學派主將張君勱先生就住在考究的西式洋房之中，坐在明亮的電燈光照之下，大寫其擁護玄學鬼，痛罵科學文明的文章。這真可謂「中體西用」的活廣告了。

至於盡量歐化，或「全盤歐化」，那不以民衆為立場，是更明顯的了。洋裝筆挺的小爺，燙髮，戴歪帽，穿高跟鞋的摩登太太們，住洋房，吃大菜，坐汽車的紳士們，他們也能說洋話，懂洋規矩，也有錢洋化，並且還有一副以洋化為光榮的心思，可是這和我們一般民衆，相去何只千里？如徐志摩等人的詩，連形式，格調，以至情思內容都洋化了，這就是和一般的所謂讀書人，也是距離得很遠。所以，提倡或實行全盤西化的仕女們，當然不會把一般民衆放在眼裏的。

再說「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吧。他們的本位的舊中國，容或不同於國粹論者的舊中國，然而這不同的，只在於前者要維持比較純粹的封建舊中國，後者則要維持當時那種半封建半殖民的舊中國而已。至於不以人民大眾為立場，則完全是相同的。

用是否以人民大眾為立場，來辨別其他種種文化思想，也是很要緊的。譬如要用國語來統一全國的語言，那當然是名正言順。可是你如把人民大眾為立場來想一想，譬如幾千萬說廣東話的民衆吧，我們知道廣東話的方言，和現在所謂的國語（其實也是一種最有勢力的方言），其相去之遠，也和外國話差不多。同時一般民衆當然沒有多的閒錢和閒空來受教育。那末你要在這裏來實施名副其實的，普及民衆的義務教育，你還會主張用「國語」麼？廣東人自己有句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打官話。」這樣的話，在方言和「官話」（也就是國語）相去很遠的地方多有得聽見。這從民衆自己眼睛裏看出來的「官話」，和他們的方言有如此的格格不入。他們（廣東的民衆們）的人數之多，等於歐洲好許多中小國家的人口之和。你如站在他們的立場，廣東話無異成爲廣東的「國語」。要在最短時期提高這幾千萬的廣東民衆的文化，你不用方言，怎麼做得到？用「和民衆不兩立的漢字」（魯迅語）的方言，也怎麼做得到？你如不是空口講白話的講講，你是真要去行，或真在實行的話，你不管怎樣反對拉丁化的新文字，你怕也只有拿起來應用了。拉丁化新文字是以民衆為立場的，所以它當然要提倡方言，否則也不成其為以民衆

爲立場了。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在形式上是差不多的，但是立場完全不同。因爲後者要幾年才學得會，那麼提倡它的人，當然不以沒有多的閒錢和閒空求學的民衆放在心上的了。

中國化就不同了。它必然要以中國人民大衆爲立場，否則就說不到真正的中國化。因爲只有少數人接收了外國的進步文化，這對於龐大的中國說起來，是算不了什麼的。而且少數人的話，都派出去留學也做得到，都使他們洋化也做得到，也用不到中國化。但是進步的文化，必須要中國民衆都能接受了，才能在中國生根，長成，成爲中國的文化。所以要中國化，就要大衆化。中國化口號的提出，就是表示着人民大衆勢力的抬頭。這只要看「五四」前後，民衆勢力漸漸抬頭，就有通俗化的白話文運動，「九一八」以後，革命民衆，多自發起來救亡，就有「大衆化」的口號提出，而到了抗戰進入第二階段，新中國已經打定基礎，中國人民大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普遍提高之時，又提出了「中國化」的口號，就可知道了。

四

第三，「中國化」口號的提出，表示着新中國文化的內容，不能以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爲主，而要以世界進步文化爲主。因爲自從產業革命以來，我們的世界，早已打成了一片。各國產業已經不只採用國內的原料，而且採用極遠地方的原料，他們的製造品也不僅在本國消費，而且在

世界各處消費着。過去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情形，是被各國多方面的交通，各民族多方面的相互依賴的情形所代替了。不但在物質生產方面如此，在精神生產的學術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今日此地有什麼新的發明，明日就為全世界所應用了。各民族的文化成果，成為全世界公共所有。各民族的文化，都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世界交流，成為不可抗的力量。在這裏，民族的偏狹性，是日益不能保存的了。所以如我國文化落後的民族，必須盡量吸收世界先進的文化為自己文化的內容，而謀趕上世界先進的文化。否則就立不住腳。

要趕上世界先進的文化，那是可能的。例如歐洲近代文明，最先起於英國，其次法國。德國比較落後。俄國更落後。但是落後的德國，後來却能盡量吸收英法的文化成果做出發點，再加以發展，居然追過英法而為「後來居上」了。俄國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提出盡量吸收資本主義文化的優秀成果，努力趕上并追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的口號。現在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之快，不是誰也趕不上麼？

那麼我們更落後的中國，應該怎麼辦呢？中山先生早已提出了「迎頭趕上」的口號。

要迎頭趕上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我以為要注意如下數點：

一、要有大量吸收的氣魄。學術文化的東西，一般說來原是沒有國境的。你向人家拿來，於人無損，於己則有絕大利益。不比舶來的商品，向人家買了要付錢，多買了，要阻礙本國工商業

的發展，所以要抵制洋貨。可是大量吸收外國文化，只要對於中國適用，就可以使中國的新文化迅速長大起來。我真不懂有些先生們，貨品可以用洋貨（西用），文化却一定要堅持「國粹」？
魯迅先生說：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薰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爲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的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就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爲孱王和孱奴的寶貝。』（墳：看鏡有感。）

所以魯迅先生提出「拿來主義」，主張外國有好文化，儘管拿來用就是了。最近馮友蘭先生，在他一篇論民族哲學中說：『例如物質論一名詞，有許多人見之即覺討厭。近人譯物質爲唯物論，尤使有些人見之即覺頭痛。』（見哲學評論七卷四期，傍點由筆者所加。）馮先生要建立民族哲學，原來只把這「有許多人」或「有些人」放在心上，作爲民族的代表。這些人見到物質論或唯物論的名詞，就有那麼討厭，頭痛。如果見到「階級」之類更刺眼的名詞，更如果想到這類名詞都要在中土栽培滋長起來，豈不真要「抖成一團」麼？然而我們要吸收外來文化，不能專去

侍候某些人的顏色。我們得問問中華民族的人民大眾的需要如何。人民大眾是滋長文化的土地。一種文化，如果不在人民大眾中生根，那至多不過是「盆景」吧了。而我國這塊廣大的民衆的土地上的文化，可謂荒蕪已極，它的急需新文化的種子，實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這只待我們文化工作者的大量吸收世界新文化來播種了。

二、要大量吸收世界新文化，那必須有計劃有系統的吸收。一般說來，中國現階段的新文化，還應該偏重於吸收。因為歐美各國在幾百年內所創造的新文化，我國要在幾十年內就吸收過來。依理論，吸收當然比創造容易。人家既經艱難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坐享其成的吸收過來就是了。而且就其結果而論，吸收的東西，也和自己創造的一樣。我嘗把創造和吸收之難易，比之於上樓。創造是要憑空上樓，吸收却只要循梯子上樓。憑空上樓，固然難能可貴，但是結果也在樓上，和循梯子上樓的完全一樣。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重視這個用力省而收效大的吸收工作。我們要把世界最進步的文化，盡量吸收過來，做新中國文化的基礎。我們寧願「大器晚成」，我們不要自作聰明，不顧人家已否創造出來，硬要埋起頭來自己去創造同樣的東西。且不說這也不容易，就是給你創造出了，精力也太浪費，如果把你的精力先分出一部分去吸收，然後以吸收來的做出發點去創造，所得不是更大麼？所以我們現在正可不必以我國缺少世界的學者，世界的文藝，世界的大發明自恥或自餒。我們現在是要先來趕上這段歷史的落後路程。要趕上，就要偏重於吸

收。

實際上我們也在吸收。不過過去和現在的吸收，還嫌沒有計劃，沒有系統。無論在哲學，科學，文藝等各方面都是如此。譬如說吧，無論那一文化部門的世界第一流的古典的和今典的著作，有完全的翻譯沒有？都沒有。因此，一般努力上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就發生了這樣一種觀念：要真正研究一種學問，就非學好一種或幾種的外國文不可，而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化在外國文上面了。所以我們要趕緊追上外國文化，就要由國家或社會團體來集中對於外國文字和文化有研究的人，來從事有計劃有系統的翻譯和介紹，如從前翻譯佛經的樣子。不要再以一般文化人因生活或文化商人因賺錢而粗製濫造的並且是無政府狀態的翻譯與介紹爲滿足了。

三、要「迎頭趕上」進步的文化，就要分辨進步的文化之中，何者是走了轉灣抹角的不經濟的路，才走到現在這樣子，那麼我們就省去不經濟的部分，直截學那現在的樣子；何者是現在正走在絕路上，那麼我們就不必從後趕去；何者是已從絕路上回頭走上光明的路，那麼我們就迎頭趕上去。自己的經驗是可貴的。人家的經驗，也一樣要作爲教訓。尤其我們現在是在抗建的大革命時代中，人家多少革命的流血經驗，都值得我們細心研究和學習。我們萬不能踏上人家的覆轍。譬如新中國的前途問題，我們當然不能使他再走歐美列強的路。中山先生早已指出：『歐美強矣，其民實困。……社會革命，其將不遠。』所以就使中國能够做到『媲美歐美，猶不能免於第

二次之革命。」現在歐美都已在這第二次社會革命的前夜了。而蘇聯則早已經過第二次社會革命的大流血的內戰了。那麼我們不走歐美列強的路，是否要走蘇聯內戰的路呢？這是在大家面前閃耀的問題。常聽到有些人說，各黨派的統一團結，在亢占的時期還做得到，亢占完了，遲早要分裂的。好像中國的前途，註定要流一次內戰的血似的。然而我真不懂，既能和衷共濟的亢戰，何以就不能和衷共濟的建國，如果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中國的民衆，固然需要和衷共濟的亢占，但是也更需要和衷共濟的建國。亢占不知何時可了，但是亢占之後，國家的元氣必然大傷，這時候爲國爲民都須有一個長時期來從事新的建設。中國老百姓如今還相信，大戰之後必有真命天子者出來。歷史的確如此。要把戰後破碎的河山建設起來，必然會有開國的英主賢臣出來。依現在的說法，必然會有英明的領袖出來。而我們現在的最高領袖，既然能順從民意，領導亢占到底，那麼亢占後一定更能代表民意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這期間，如果再加上國際形勢的新變動，如某些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了，那麼新中國和平發展到新社會去的路，不是不能的。不過要走這樣的路，必須要接受人家的革命教訓而好自爲之。

五

第四，「中國化」口號的提出，表示着「中國化」雖以世界的新文化做內容，但是仍要中國

人做主體去消化。所以要拿來中國化的東西，一要適於中國人的需要，二要合於中國人的口味。適於需要的東西，可以不合口味，如良藥苦口。合於口味的東西，也可以不適應需要，如鴉片上癮。所以拿來中國化的東西，又先要擇其適於中國人需要的，然後將其改造成合於中國人口味的，如苦藥包上一層糖衣，又好吃，又受用。而中國人的需要，是由其特殊的歷史條件所規定，中國人的口味，亦在其長期的歷史環境中所養成。所以中國化運動，固然要知道外國文化，同時更要知道中國的歷史。歷史的發展，可以有突變，即突然由舊變新，但不能割斷。新的不能憑空而來，它要從舊的發展而來。新和舊，在性質上可以截然不同，但其間仍有密切的關聯。不深知舊的東西，不能對舊的東西下批判，起革命，簡直不能突變為新。制度如此，文化更如此。所以中國化的口號，和接受遺產的口號，在表面上看是完全不同方面：一個是要吸收外國的優良的新文化，一個是要接受自己的優秀的舊文化。可是要接受自己的優秀的舊文化，就先要站在新中國的革命的觀點。如果仍舊站在舊中國的觀點，那麼舊文化一線相承，就無所謂接受不接受。這一點是一切講「接受遺產」，講建立「民族哲學」，講恢復民族固有文化的人，所首先應該弄明白的。而新中國的革命的觀點，本身就須進步的新文化培養起來；這只要看為新中國而革命的人，沒有不受新文化的薰陶，以及真能整理舊文化有點成績的人，沒有不用新的科學方法就知道。所以接受遺產，少不了把進步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在舊文化上，也就是少不了把進步的理論和方法中國

化。另一方面，中國化如果不利用舊文化的優秀成分做引子，就化不過來。好比是侵略者利用我們的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做內應，中國化也應該利用舊文化的優秀成分做「內應」，盡量把外國好文化化過來才是。這樣，新文化與舊文化，中國化與接受遺產，就有機的結合起來了。

關於接受文化遺產的問題，很多人都以為主要的文化遺產是那些寫在紙上的和附在遺物上的東西，其次才算到民間的習俗和傳說等。然而民間的東西，實在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為記載的東西，很多是已經死了的。但是現在還活在民衆生活中的文化，都是和民衆有血肉的關係，優秀的固不要說，就是對於民衆有毒害的，也因為作用很大之故，應該十分的重視。並且那些記載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也還是反映着民衆的需要，趣味，感情和理想最多的部分。一般說來，自來民衆所發展起來的智慧和文化，總比統治者寄生蟲的文化要豐饒潑辣得多。我國的民衆，自來都很大公道，重義氣和仇視侵略者。無論那一時代，愛國的情緒，和民族團結的熱情，都深深藏在我國民衆心裏。自來武將有多少，但民衆獨愛能够抵禦異族侵略的岳武穆，在民衆面前只要提起「裏通外國」四個字，那就是比什麼都大的罪名。又民衆因為一向被人壓迫，剝削，欺侮，所以又非常主持公道。民衆並不重視那些聖人，賢人，忠臣，烈士等，但非常重視義氣。所以他們最尊敬關公。因為關公最有義氣，任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都買不倒他，他總是一心記着自己結義的兄弟。這樣傳說着的關公，自然已成為民衆意識的反映，民

衆的化身。只有無聊的文人，才會去做翻案文章，說歷史上的關公，並非如此。也有人給岳飛做翻案文章，說他是橫暴的軍閥。並且還自以為尊重「歷史事實」。可是歷史上的民衆的情緒與口碑，難道不更是事實麼？這真是目無民衆，對民衆的大侮辱！

所以我們要接受的文化遺產，應該是指的反映民衆需要和智慧的部分。譬如退讓的道德，並非民衆的道德，民衆是不怕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

『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魯迅：女吊）。

我們在舊文化中，應該看得出吸血吃肉者的秘密和在模糊中所閃耀着的民衆的真意。譬如民衆因為常受壓迫，無處發洩，所以最歡喜聽打抱不平的俠義故事，義俠的故事以及輪迴報應等思想中，就含着統治者麻醉民衆的秘密，但也流露着民衆的正義和公道。民衆的思想和統治者的思想總是雜揉在一起而為統治者所統制着。而統治者尤善於把民衆的東西巧妙地歪曲之後用以麻醉統治民衆。我們說接受文化遺產，就要接受舊文化中的民衆文化以及對於民衆有用的成分。我們說中國化，則要站在中國民族大衆的立場把外國文化和本國民衆文化結合起來。所以中國化，要注意如下二點：

一、要強調中國民族的特殊性。特殊性是在一般的情形中形成的。現在中國民族的特殊性是在世界一般的情形中形成的。現在的世界，封建制度早已過時了，中國也決不能再留在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已經總崩潰了，中國也決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的繁榮的路，現在是在世界革命的前夜了，中國自然也在世界革命的前夜。特殊性又有他不同於一般的地方，否則即不成其為特殊性。中國民族的這種特殊性，在於他一隻腳留在不能留的封建制度上，一隻腳走在不能走上的資本主義的路上，在於他不能一步跨上社會主義，又要兩步并一步的越過資本主義跨上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以及將來可能和平轉化到新社會去的特殊性。走這樣的路，在中國，在世界，都是空前的。我們要應用世界最新的科學理論和革命理論，來進行中國民族獨創的事業。（這是最大的中國化）。所以很多事情，我們正可不必因為各國都無先例而為反對的藉口。

二、要強調利用民衆愛好的形式，即所謂舊形式，或民族形式。中國民衆之多，是世界第一的。現在要使這樣多的民衆，在短時期內吸收外國在長期間所進步的文化，這也是空前的。所以必須大胆利用民衆愛好的舊形式。舊形式中包含新內容，總是帶着非常的革命性的。根據內容決定形式的原理，當新內容包含到舊形式去的時候，舊形式也必多少已經起變化。並且隨着新內容的漸漸為民衆所熟悉，那新內容必然漸漸擺脫舊形式而創造新形式。新內容配上新形式，那已經

完全是中國東西了。但是過渡的時候，却必須新內容和舊形式的中國化，真正的中國化，必然是中國民衆通俗的舊形式和世界新文化的結合。

六

將以上的四點綜合起來說，第一，第二是從縱的方面說，即新中國的文化和舊中國的文化，民衆的文化和少數人的文化的關係的問題，第三第四是從橫的方面說，即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亦即所謂「國際的內容和民族的形式」的問題，而這種縱的關係和橫的關係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都在這個簡單響亮而含義深刻的「中國化」的口號中正確地表示出來了。

現在說一說如何實行中國化。

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在政治經濟不改革的時候，文化就會停滯着，在政治經濟長足進步的時候，文化也必長足進步。前面說的德國文化所以能追過先進的英法，也是因爲當時英法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權之後，就停滯着不前進，而德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則在着着抬頭起來。現在蘇聯社會主義文化所以有駕凌列強之勢，也是因爲列強資本主義是在落沒之中了。又如我國每一次文化上的向前發展，都是和革命運動是繫着的。每一次文化上的逆流，也都是政治逆流的反映。所以中國化的文化運動是不能和革命運動分開的。

但是文化運動當然也能促進革命運動。尤其是在如中國現在處在抗建的情形中，客觀上政治經濟都需要大大的改革，這就是說文化運動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具備着，在這時候正確的文化思想很容易被民衆所接受。文化思想爲民衆所接受，就成爲物質的絕大的力量。

再說一點中國化的實例。

實行中國化，必然要着眼在民衆身上。所以中國化常見於商品上和傳教上。商品要民衆買，銷路才大。如陳嘉庚式的鞋子，一面保持着認左右脚的西式的優點，一面又保存着中國式，可說是很好的中國化。有些東洋貨，也是很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很講究中國化的。但是中國化實行最早也最有成績的，還是傳教。佛教的中國化之成功，這是不用說的了。就是教會的傳教，其成績可着實不差。傳教的對象是民衆。要叫中國民衆相信他們最反對的洋教，這真談何容易。然而教會有經濟政治的力量做後盾，有一貫的確定的宗旨，他們設立教堂，學校，醫院，他們知道如何拉攏地方上層勢力，如何給貧苦民衆的一點實利。就說他們傳教所用的語言吧。當中國文化人儘在紙上辯論文言，白話，大衆語的時候，他們是一聲不響。但是他們一直是在把聖經的道理用各地的土話講給大家聽，用各地的方言翻譯給大家看。中國似乎沒有一本書用過幾種方言寫的。但是聖經有近百種的中國方言的翻譯本。他們的翻譯，又是那樣大胆的採用土話。教會裏的許多宣傳品，實在是非常通俗化大衆化的。然而他們沒有特別提倡過什麼通俗化，大衆化或方言土語，

他們只是站在實行上如此的做。但是奇怪的，却似乎又沒有一個反對白話或方言土語的人反對過聖經的方言，土語。教會裏據說還有用拉丁化的文字教大家的，并且成績也很好。傳教的內容，完全是外國東西，他們所用的形式，却非常中國化，所以有很不差的成績。從事中國化的人，很可把這件事情去想想。不過舶來的商品和傳教的中國化，他們的內容是於中國不利的。它們是要借中國化的手段征服中國，使中國長遠停留在於它們有利的地步。它們有了這個大矛盾，所以最多只能有相當的成績，決不能說到成功。等到中國人民都覺醒以後，並且要完全失敗的。但是真正的中國化，却是內容於中國十分有利的，並且是要用中國化的手段，將中國化成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真正的民衆國家。所以中國化運動的前途是無量的。

生命哲學小討論

孟 堅

近幾年來，我國的刊物上新添了幾個名辭，或「術語」，例如「唯生論」，「唯生論的歷史觀」即「民生史觀」等等。其他的姑且不論，現在單講這二個。名辭的確是新的，可是內容並不是新的，祇是舊內容改換了新名目；或者竟是沒有內容的空名辭。現在預備在下面略加說明。雖然祇是極簡單的說明。

先說唯生論吧，這有幾派：一派說，一切物質的原素本來，就有生命的屬性的。這一種意見並不是新的，是很早就已有了的。在哲學雜誌第二期（讀書生活社出版，現已停刊）上，何明已經指出了：「古代希臘哲學家推爾斯及赫拉克立圖斯這些人，就有一切物都有生命或精神的意見。經過文藝復興時代的白魯諾，加申第等，到蒲列漢諾夫說「石子也有思想」，等等，都屬於這一類。不過這種意見，在哲學史上普通稱為物活論，不稱為唯生論。物活論者不能精密地觀察宇宙，也不能生動地思考物質，覺得生物的能生活，或有精神有些不可思議。如果無機物質沒有生命或精神，生物怎麼能夠產生這些呢？於是說物質本來都具有生命或精神，對於解釋生命和精神起源問題，可以方便些。

這種意見也叫做萬物有生論，是一種樸素的意見。從前思想樸素的人們，對於物的生活或不生活是分別不清楚的。今日還有些人相信岩石類中有生活的活石，它會長大起來，或曾經長大起來過的，有時又認為有水草，能流動，而且澄清的水為活水，稱停滯，腐臭的汗水為死水。水也有死活之分。哲學上的物活論，和這種意見相去並不很遙遠，和科學的考察相去是很遙遠的。哲學上的物活論不過把這種樸素的見解推廣了一步，泛稱一切物都是活的，或都有生命或精神。但是這一種見解，甚至和一般「教科書」上所指出的生物能生長，生殖，有呼吸，能消化等作用，所以和無生物有分別的說明亦不相容。和歷史的考察，說生物經過漸變和突變，從無生物產生出來，而獲得新性質的意見，自然更不相同。因此，物活論在近代科學的哲學上已很少說起，這裏是說明有一派唯生論的主張，是舊內容上面加了一個新名辭。舊內容不能因了名目的更換而變為新的，它陳舊如故，這是用不着說明的。

還有一派唯生論在企圖離開物活論的束縛，另行開闢一個新門徑。（古代亦有人說過最初的基本本為精神的。）他不說元素都有生命這一屬性，他算是更進一步，說元素的本身就是生命！照此說來，不單是草木蟲魚由生命元素造成的，便是泥土，岩石，以至金銀銅鐵也都是生命元素造成的。但這一種見解和全部的科學相矛盾。科學講地球的歷史時，必定說最初的時代是無生代，以後是產生原生動物，珊瑚，魚類，兩棲類，爬蟲，鳥類及哺乳類等等的時代。如果元素本是生

命，那麼地球本身應當便是一個生物，因為這是由生命造成的。但是實際上沒有方法說明地球是一個生物。就是有人這樣說，也沒有人會相信他。

而且生命或性命這些名辭，本是指生物的生活現象，如呼吸，行動，長大等等而說的，它不是離開生物體能夠存在的東西。正如水的漩渦不能離水而存在，風不能離空氣的流動而存在，如果說構成物體的元素，就是生命，實和說空氣由風構成，水由漩渦構成，或煤炭用火做成，相似的講不通，如果說構成一切物的元素，就是生命的話可以成立，那麼也就可以說元素是思想，是感情，是笑，是哭，或別的什麼。所以這一派的唯生論；表面上是比物活論的唯生論推進了一步，實際上更沒有內容更空虛，祇剩了一個空名辭了。

此外還有一派唯生論者的見解，說生物都有求生存的欲望，求較好生活的欲望，因此推論到社會的進步由於這些欲望的推動，早先戴季陶，周佛海提出這種意見，十年前已被潘文鴻駁斥過了（見於一九三〇年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編者序。）後來黃文山又寫了一本唯生論的歷史觀，出版於一九三五年，這著者的意見，和戴周二人的意見有些相似的，他說：「一部人類社會進化史，從頭到尾，不外是一部人類滿足『生』之要求的歷史。」他不但講到人類的求生存，也講到動物的求生存的問題。這種苦心，誰都看得出。

這裏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生物，是否有求生存這欲望的問題。通常是說動物「要求生存的，」

(植物的生活現象比動物較不顯著，且不去論它。)其實，在動物裏，表現出這種求生存的現象來的，不是由於什麼欲望或意志，而祇是一種存在形態的表現，這就是說動物存在着，是有這種狀態表現出來的。生物是由原形質構成的，原形質存在時，有一種變化過程，通常稱為生理作用。如果這作用順利的進行着，它存在，即活着，而且「舒適」的，如果物質被破壞，組織被毀傷，或「生理過程」受障礙時，生活就受阻礙，或死亡，在高等的動物，更會發生不舒服或痛苦。在最下等的生物裏，它們沒有神經，不知苦痛，但有反應。微生物如遇光或熱，或什麼對於它們構成身體的物質能起什麼作用的物質，它們會進趨或避開。有時候它們遇一種刺激進趨，但如果這刺激過強時，它們避開了，好像它們要保存它們的生活似的，實際上它們並沒有這種欲望，祇是一種反應作用。

在高等的動物裏，神經系統已發達，知道苦痛和快活了，它們餓時，凍時，渴時，等等，會覺得不舒服。如果吃下毒藥，藥物把它們體內物質組成發生破壞作用時，也會覺得不好過。飢餓等等的 discomfort，使它們要去尋找食物等等，中毒以後，會表現出難受的形狀來。東西吃下去，把飢餓醫好了，食欲滿足了，它們覺得舒服了。中毒時，如果設法解救，毒力消失後，苦痛減少。受了損害的物質及組織恢復起來，它們也覺得舒服起來，苦痛既消失，改換了活潑起來的樣子，又從動物的被打表示痛楚，受恐嚇表示恐怖等現象裏，人們就設想生物有求生的欲望存在

着。其實在不自覺的動物裏（植物更不必說）並不一定有這樣的一種欲望存在，宇宙中更沒有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存在。——雖然動物避開痛苦是知道的，找尋適宜的地方和食物它也會，它也要吃等要求，如果說生物都有求生的欲望，那麼也可以說生物都有求死的欲望。因為生物都免不了一死。生裏實含有死，一天天的生活下去，也就是一天天的死去。

人類應該是有求生的欲望的。眼見得許多人都「貪生惡死」。這是事實。一般的人們遇到危險，力求掙扎出險。人是能自覺的高等生物，這一點自覺的求生存的欲望莫非還會沒有嗎？是的，我們現在要分析什麼叫做欲望。欲望有各種各樣的欲望，有的從胃空虛了，口乾燥了產生的，有些從思想或幻想產生的。胃空虛了想吃，口乾了想喝，苦工做得太苦了覺得負擔不起，想避免或反抗，這等欲望，主要是受身體機構所決定的，此外，愈是由思想方面發生的欲望，便愈離開身體的生理要求，而愈受生活條件歷史的，社會的，各種複雜關係所決定。有些人生活得很苦，然而仍然苦苦的生活着，並不自殺。有些人，爲了失戀，爲了投考失敗，爲了口角等等，就自殺了。麗芒湖上（最近出版的一種文藝叢刊）載目蓮救母記的作者在一段文章裏，講起有些老人從從容容的自己預辦身後之事，如給女兒辦嫁裝一樣（大意如此，因書不在手頭，一時記不清楚，覺得很歉缺。）他們已不戀生存，好像情甘理得的預備死去了。我們如觀察的事實愈多，愈相信生存要求強烈與否，生活上還是墮落，甚至於求生還是死，是由上述的各種關係來決定。

的，我覺得很難抽象出來說，古今中外的人類，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都有怎麼樣的一種欲望。

現在講到人類是不是要求較好的生活的呢？生活受了挫折，有些人便要自殺，這很可以證明人類是要求較好的生活的。很像他們不願過不好的生活，所以自殺了。但這裏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什麼叫做「較好的生活？」普通叫做較好的生活，大抵是指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住的舒適些，不必做辛苦的事情，有相當的娛樂那種生活。即指一種較舒適的生活。這是的確的，過於勞苦的勞動，使血肉的身體負擔不下時，是要反抗的；受人奴役和壓迫，也決難忍受。但是人們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之下，產生不同的意識。是不是人人在任何狀況之下，都有過舒適生活這志願很可討論。這裏首先叫我們想起了偉大的馬克斯。如果他個人要過較好的生活，莫非不能建設一個舒適的家庭嗎？然而他要革命，要寫資本論。出版前，他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爲了這個工作，犧牲了我的健康，我的幸福，和我的家庭。」他因爲要這樣做，陷於極端窮困，且時常生病，許多日子在痛苦中度過。兩個愛子夭折了，他的妻，也因操作過度損壞了身體。（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第四篇，羅園譯）新知書店出版。）

接着又使我們想到偉大的伊里奇。這裏不講別的，單講他的私生活的情形，蔡特金女士告訴我們說：「列寧遇有必要的時候在國務院見客，然而他的私生活却極其簡單，極其率真。我到過幾個工人的家庭，其中的設備比這位『操有全權的莫斯科獨裁者』的家庭來就富麗得多。我曾經

看到列寧的太太和妹子在吃晚飯，那時候她們當即殷勤的叫我一同吃。這是簡單的晚餐，適應着國難時期的需要，茶、黑麵包、牛油、牛酪。過後，那妹子要爲我這個『貴客』找一些『甜甜的東西』來，便找了一個小小的糖果瓶，大家知道農民們曾經把白麵粉，牛肉，雞蛋，水果等禮物送給『他們的伊里奇，』可是什麼也沒有留在列寧的家裏，一切都轉送到醫院和托兒所去了。列寧的家庭嚴守着不比別人，不比勞動大眾享用得好這一個原則。」（見憶列寧，胡仲持譯，珠琳書店出版。）

伊里奇的不肯比勞動者享受得好一些，馬克思的獻身於社會改革和著作，三十多年如一日，困苦終身，或者可以說這是大革命家的人格，少有人敢希望這樣的。實際上還有些研究者或發明者，常長時期地努力於一些工作上，爲的是要把工作做成功，倒不一定爲了自己要享受什麼。這種人也是有的，我個人這樣想，社會的改革及大大小小的進步，依靠這種力量一定很多。前面已經說及，意識是由時代，社會的關係，等生活情形決定的，不但人都有謀個人較好生活的欲望之說頗可疑，即使有的，單純這種欲望，如沒有別種理想，也能够叫人從鑽營，舞弊貪得欺騙等種種方面去滿足這欲望，對於社會的進步不一定會有益處。

不能用生物學或心理學的用語或說明去解釋社會的進步，正如不能用物理化學的用語及說明去解釋生物進化及心理現象一樣，因爲截止今日爲止，研究者各守一定的範圍和方法的，雖然彼

此都有關係，但所關連的往往祇是某幾點或某幾面，如用甲去說乙，必然偏而不全，或竟完全錯誤，況人和別種動物不同，是會利用和製造生產工具的，因了生產工具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人和人的關係也複雜化，在這種情形下面，個人的欲望，對於社會的直接作用就減小了，所以潘文鴻先生曾經說：「人的生理上的機體構造，使人不與禽獸一樣，祇簡單的祇有求生存的希望。欲望是沒有特殊作用的。」這裏我可以加上一句，就是有生活得較好的欲望的話，也沒有什麼正面的（使社會進步的）特殊作用。讀者如要明白社會進化的情形，應該讀好的講社會進化的書籍。

假如英國失去印度

君 萱

假如英國失去印度，牠在本次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將受到什麼樣的打擊呢？

這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這篇短文打算從戰略上、軍事上、工業上和經濟上四方面加以解答。只要認清了印度在上述四方面的重要性，我們已多少可以明白，印度如果獲得獨立，不僅英國無法支持現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甚至大不列顛帝國的殖民地體制以及世界的帝國主義統治，也將受到致命的打擊。

一 印度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印度在大英帝國戰略上軍事上等方面的重要性是這樣顯著，以至目前印度日趨猛烈的民族革命運動，對英國全部的作戰力量，發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當英國談到牠在東方的『生命線』時，牠所指的是蘇彝士運河和經由印度的那條航路。如果沒有印度的合作，牠這條『生命線』就無從保持。同樣，印度在大英帝國的防務上，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如果失去了牠，英國在近東中東和遠東，就不能不處於孤獨的甚至絕望的地位。

隨着現代飛機活動範圍的擴大，印度的戰略的邊境，在東面已展至新嘉坡，在西面已延至蘇彝士。印度所處的地位，恰好介於大英帝國遠東殖民地與近東殖民地之間，因此，在地理上，牠是東方戰場的鎖鑰，和接應埃及與馬來半島間各戰場的最理想的中心。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發現，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之後，英國爲研索美索不達米亞戰役（Mesopotamia campaign）而設立的皇家委員會，就會建議，爲着支持近東與中東的戰爭，在亞丁之東應有一個工業的供應基地。這建議的對象，顯然指着印度。

印度不僅在防衛蘇彝士，亞丁和新嘉坡等重要戰略據點上，有着決定的作用，而且是壓倒近東中東遠東的民族運動與進攻蘇聯的主要根據地。在蘇芬戰爭前後，協約國會竭力在蘇聯西北西南和南部邊境各地，組織反蘇陣線。協約國進行這種戰爭時，印度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重心。因爲印度本身是與蘇聯接壤的國家，而且策應着近東一帶的戰事。（在德國第六號白皮書中，就會指出，英法企圖由伊朗及伊拉克進攻蘇聯巴庫及巴統的產油區。）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英國就會以印度爲本據，出兵進攻美索不達米亞（即今之伊拉克）和波斯（即今之伊朗）。法國的投降與義大利的參戰，以及地中海之成爲目下歐戰的重心，使印度在本次英國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中的重要性，更加提高。英國在地中海的航路既備受義大利空軍的威脅，埃及及近東等殖民地的保持，對大英帝國的存在既有着決定的意義，那麼，英國對印度的倚賴必然更加

深刻。近東和北非等處的英軍，不僅在戰略上以印度爲他們的穩定的後方，而且從牠那裏獲得軍需及食物等的供給。假如大英帝國失去地中海，便要失去整個戰爭的話，那麼，假如英國失去印度，牠便要失去地中海。

然而，印度現在已面對着一個重要的威脅，這威脅在牠的歷史上還是空前的。這威脅不是來自西方與北方，而是來自東方。由於大英帝國（應該多謝那已死的張伯倫）二十幾年來爲鎮壓中國與對抗美國，不斷綏靖和援助日本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已成爲大英帝國一個新的敵人，因此印度又負着一個新的，歷史上所未有的任務：支持未來的英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戰爭。大不列顛帝國在遠東和南太平洋的全部利益，現在正不絕如縷。印度本身之遭遇軸心國進攻，雖然還比較遙遠，但成爲印度的一個構成部份的緬甸，以及馬來半島上的新嘉坡，却隨時有被攻擊的可能。正如英國不能不進行兩洋戰爭一樣，印度現在也成爲策應和供給東西兩大戰場的一個中心。又正如上面所說，英國失去印度便要失去地中海，失去地中海便要失去整個戰爭一樣，如果英國失去印度，牠就無力防衛新嘉坡，如果失去新嘉坡，遠東的大英帝國就必然要沒落。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印度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二 印度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這裏，主要是敘述印度的軍力與人的資源。

『向來，當英國的帝國主義利益，在東方的任何部份受威脅時，印度就提供陸軍以供帝國調遣，從一八三八到一九二〇年，印度陸軍先後在印度境外作戰不下十九次。正如藹理斯爵士（Sir E. Ellis）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牠不僅是防衛當地的地方部隊，而且是亞洲權力均衡上的主要因素。依克尊勛爵（Lord Curzon 前印度總督）的話來說，自從一九一四——一八年以來，印度一直就是「大英帝國防務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單位，牠給予英政府處隨時可以使用的而且效率卓著士氣極佳的勁旅。」』（註一）今日，印度的陸軍已被作為英軍的東翼，而且執行着帝國總參謀部委派給牠的任務。

印度的全人口是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佔整個大英帝國人力的百分之七十一。這偉大的人力，不僅成為英國資本家殘酷剝削的主要對象，而且是用以製造砲灰的一個來源。印度平時的陸軍除直接由英國派出的地方軍（約一萬五千名）外，大體可切為兩種：其一是正規的陸軍，其一是保安隊。前者數目較大，約八萬員名，後者則在七百萬員名以上。陸軍的主要作用是用以對外，在英國百年來各次侵華的戰爭中，印度的陸軍就是牠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基幹部隊。在本次歐戰之前，牠包括十二個英國步兵團隊和三十六個印度步兵團隊，部隊的編成印人多於英人。保安隊的主要任務則是鎮壓印度民衆的叛亂，因此英人所佔比數，要以印人來得多，即二十

八與二十七之比。印度的陸軍近年來在量方面，雖未有增加，但在質方面，却有顯著的改善，一九三五年又增加了若干砲兵聯隊。此外，又有若干輔助軍，印度王侯軍 (Indian States Army) (即印度各土著王團所直轄的陸軍，直至一九三八年爲止，共有四五，〇〇〇名，) 民警，武裝巡警和特別武裝警衛團，如西北國境警衛隊，東部國境警衛隊以及阿薩姆的萊福槍隊等，所有這些，在必要時都可以改編爲正式的陸軍。(註二)

此外，印度還設有空軍和海軍。空軍方面，除駐於境內的英國皇家空軍大隊外，印度本土的空軍，在戰前計有八大隊，戰後實力又增加了二分之一，即四個大隊，共十二大隊。海軍在戰前計有小型軍艦二十艘，現在已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二倍半。(註三)據英國海軍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所宣佈，印度領海的海軍，自一九三九年以後，實力愈見強大，司令斐也赫勃脫將軍的任期已經延長。除印度本土造船廠現正竭力建造海防用的艦艇外，澳大利亞也正爲印度承造若干較大的海防艦，俾印度海軍在短期內能迅速增強。同時，英海軍部又宣佈，若干新式戰艦，不久也將開赴印度。印度皇家海軍的人員，自一九三九年起，一年之內，已增加百分之二百，目下仍

(註一·二)見 K.S. Shetyankar 所作的印度問題 (The Problem of India, 1940)

(註二)見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紅星報所載軍區司令巴科夫所作一文，譯文見去年十月六日重慶新華日報，

在繼續擴增中。(註四)

依照新的擴軍計劃，印度空軍將增加四倍，並設立航空學校十所，每年養成飛機師三百名及飛機機械師二千名。為解除指揮人員缺乏之困難，除加緊由後備軍中選拔人材外，又設置特別組織，從印度貴族中選拔軍官，以作為新軍的幹部。一九四〇年新成立之八個地方團隊，（每團計八千七百名，並附飛機五小隊，）其幹部大半就由印度人担任，軍力的增加與配備的改善，以及擴軍計劃的執行，使印度民衆的負担，急劇增加。據紅星報的估計，一九四〇年度印度政府的戰時預算，已較前激增二萬萬盧比（依十三盧比合一英鎊計算，約合一千五百四十萬英鎊，）而軍費則佔整個預算百分之七十，這就是說，印度目下用以擴充陸海空軍之費用，竟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比之巨，（即等於一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這巨大的費用，顯然只有靠增稅一法加以彌補。（關於這一點，我們留在第四節再談。）（註五）

照上面的敘述看來，印度軍事上最主要的力量，顯然是陸軍。究竟印度目下陸軍已擴充至若何程度，因英政府保持秘密，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按照經濟學者周刊所估計，直至一九四〇年年

（註四）見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申報

（註五）何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倫敦出版的經濟學者（The Economist）及上引紅星報論

底，牠的正規陸軍至多只有二十六萬員名，但據美聯社主任訪員軍事分析家金姆爾（Louis F. Keemle）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的估計，牠已由一六〇，〇〇〇員名增至五十萬員名，必要時還可以增至一百五十萬員名（註六）。無論如何，印度陸軍的數量，當較平時大為增加，而大英帝國正利用這些部隊以增強北非近東及遠東一帶的防務。根據英政府印度事務部大臣愛梅立（J. S. Amery）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英國下院所說，直至當時為止，印度已派至海外服務的，已達六萬名。（註七）這數字是否可靠，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印軍的調動非常秘密，甚至印度人本身也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已經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印度正規陸軍，不僅在歐戰未爆發以前，即已派至埃及，成為協約國在東地中海的基幹隊伍，而且在亞丁和新嘉坡的防軍中，印軍也佔大部份，甚至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那有名的鄧扣克戰役中，印度正規軍也曾正式參加，由此可見印度陸軍已廣泛地為大英帝國所前用，而被派至各個重要的戰場了。這裏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英政府本會允許印度中央議會，如未獲得會議的同意，不能調離印軍出國，但英政府從未履行諾言。

但是印度民族獨立的抬頭，與印度人民對英國統治者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憎惡，使英國政府利用印度正規軍時，遇到了非常嚴重的困難，這情形是一九一四——一八年英國利用印軍時所

（註六）見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上海 China Press

（註七）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

未遇到的，在去年八月日本的讀賣新聞上，曾發表該報駐新嘉坡訪員的報告，據說新嘉坡平時駐防軍共一，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爲印人，當局對英印士兵的待遇極不平等。自五月起（一九四〇年）至八月止，逃回印度之印籍士兵竟達四千名之多。這報告當然有誇大的地方，但在遠東帝國主義戰爭即將爆發的時候，這一事實倒是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註八）

三 印度在工業上的重要性

大英帝國對印度工業與豐富資源之需要，比對人力的需要還要迫切。沒有印度各種重要資源與軍需品的供應，英國簡直無法在近東與中東遠東一帶，進行消耗極大的戰爭。印度不僅富於各項主要的礦產和原料，如鐵，煤，錳，鎳，鉛，錫，鹽，油，木材，毛皮，棉花，黃麻以及五穀，而且牠本身是世界有數的工業國家（在世界十二個最大工業國家中，印度即居其一。）在地理上，牠又可以供應各處英軍的需要，使英國的工業減輕負擔，還可以免除運輸的困難與海上的危險。所以在這次的帝國主義戰爭中，英國對印度的倚賴，比一九一四——一八年時還要深刻。據金燧爾的估計，不久之後，印度已可能獨自供給近東中東遠東英軍所需要軍用品的百分之九十，包括武器，彈藥，重砲，坦克，機械配備，車輛，衣服，皮靴，帳幕，木材，機油，棉織物

（註八）見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及七日東京讀賣新聞。

以及食品，即飛機也可以在印度製造。

英國龐大的軍事計劃，已迫使全印工業供其驅使。目下新兵工廠正在加緊建立或生產中，舊有的也已加以擴充。一九四〇年六月，印度政府曾宣佈撥出二十五萬鎊，以擴充軍需品的工業，同時軍需品的生產已比一九三九年激增至兩倍。直至去年十二月底止，英國在印度的定貨（包括軍需品及原料）已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巨。當然，目下這種情形，還不能滿足英國戰時迫切的需要。在去年八月，英政府又派遣以羅傑爵士（Sir Alexander Roger）英國密得蘭銀行之總裁）為首的特派使命團至印度，檢討增加軍火及其他軍用品生產的問題，俾能一面供給印度本身的需求，一面又可以滿足中東及蘇彝士運河以東各地英軍的需要。

更具體地說來：印度是一個農業的國家，牠一向是五穀，棉花，（其產量只次於英國）茶（佔世界第一位，每年供給英國紳士達五萬萬磅）黃麻木材等的生產者和輸出者，直至去年十一月為止，印度已輸出十萬萬隻麻袋，以給防空及作為沙包之用（見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愛梅立的報告。）此外，麻織工業又接受了價值八十萬鎊的定單，包括製造七一三，〇〇〇，〇〇〇隻麻袋，印度的毛織出品，已全部提供英軍應用。皮靴的出產，每月達一二五，〇〇〇對，目下製鞋業正為英軍趕製價值七十二萬鎊的軍靴，而已運至英國的，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對。一年半來，英國從印度輸入的帳幕，也達三萬座之多。

印度的鍊鐵與製鋼工業，目下仍在發展中，在上次大戰時，印度鍊鐵工業還十分幼稚，但在近十年來，鋼與鐵的生產，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鐵塊的生產已在一百五十萬噸以上，鋼塊也達九十萬噸，現在每年鐵塊的產額至少達二百萬噸，鋼塊也在一百萬噸以上。全印所有鋼鐵工業目下正日夜開工，其所接受的定單，已超過幾個月的生產。煤的產量也急劇增加，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德里消息，希臘，中東以及蘇埃蘇丹香港第處，都已向印度定購煤斤，同時建築防禦工事所需要的鋸片，已有大量運至近東和瑪爾太。金屬品的出口，因自身需要的迫切，已禁絕出口。戰前印度生鐵每年出口達六十萬噸，（主要運至日本），現在已規定運往日本的生鐵，每月不能超過一萬噸。各項生產軍需的工業，均由印度政府派員監督。

在本次大戰之前，印度本已計劃由礮土提鍊鋁（飛機工業最需要的原料），現在不唯提鍊工作很有成績，甚至連礮土都取自印度，而不須由國外輸入。軍火工業最近也大有發展，大砲（包括六吋口徑的大砲和榴彈砲），步槍機關槍等正在大量製造中。印度平時陸軍所需要的來福槍以及上述各項武器，百分之九十即為印度兵工廠所供給。據愛梅立所宣佈，直至去年十一月為止，印度運往英國的小武器子彈已達一萬萬發，砲彈也達四十萬發之多。

加爾各答及孟買等地，現在正在設廠裝置美國發動機的裝甲車。美國萬國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和福特汽車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其工廠正在擴大中，此後每年將增加二萬五千輛汽

車，以供軍事當局的應用。孟買，以及沿霍格里（Hooghly）河一帶的造船廠，現正積極建造軍艦及商船。此外，防止磁性水雷的電線，也已由印度工廠供給，海軍用的電線，也在大量製造中。印度的化學工業，（包括印度化學工業公司），目前已有大量出品，包括硫酸鹽，苛性曹達，曹達灰和肥料等。（註九）

最後，就是飛機工業了。這工業在印度還只具相當的規模，但牠的發展却是異常迅速的。資本五千萬盧比（二，七五〇，〇〇〇英鎊）的印度飛機公司，已在彭加羅爾（Bangalore）建立由美國專門的技師監督，建造各種軍用的飛機。據西謨拉去年十月五日路透電訊，此一工廠的建立，係由印度英僑，當地行政官和軍事當局討論後所決定，這工廠所產的飛機，主要供防禦之用，印度政府不僅協助該廠購置所需用的機械，而且應允每年向該廠購機五十架。至於廠址之決定設於彭加羅爾，是因為在該廠附近，可以獲得廉價的電氣與高等的鋼鐵。（註十）此外，據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報告，英印軍火探辦團，在杜特將軍（General Tute）領導下，正在美國購置美機，並且和英國飛機製造廠家談判在印度設立飛機工廠。（註十一）

（註九）以上所述，主要依據The Economist，另由其他刊物及報上消息加以補充。

（註十）見上海德文遠東新聞報英文午報，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

（註十一）見十月六日申報。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由同盟社去年九月二十五日由紐約發出）美國有名飛機總公司經理巴來氏，爲在印度建立製造廠，已於九月中旬（一九四〇年）由印度調查完畢，返至紐約。按巴來氏曾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在中國內地設立飛機製造廠（主要是修理，配合機件以及製造零件），英政府大概是有意利用巴氏的經驗，俾動員印度廉價的勞動力，以製造各項需要的飛機（註十二）。所有這些消息，證明印度軍需工業，目下正在迅速擴展中，甚至如製造飛機的工業，也已開始建立了。

然而，正如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利用印度人力時遇到重大的困難一樣，當印度各項工業與軍需工業不得不僱用反帝和反戰的印度工人時，他們也一樣要遇到無法避免的困難。另一方面，英國的以及土著的資本家與軍火製造商，對印度工人的剝削也非常驚人，所有工人，每天差不多要作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工作，而工資只及英國本土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此外，他們又盡可能地利用童工和女工。罷工的案件日見增多，這是不斷可以從袒護英國的若干華文報上看到的。因此，像霍華德（E. Howard）如下的談話，顯然是過份樂觀的論調。他說：『印度的經濟條件非常優良，印度人也在極大程度下與英政府的軍事努力相合作。印度土人絲毫未被剝削……失業實際上並不存在。』（註十二）不錯，由於軍需工業的膨脹，失業的數字是減少了，但

（註十二）見同盟社國際經濟週報二十一卷四十號（昭和十五年十月）

牠還殘泊着最少達五百萬人的失業工人。同時印度土著資本家，在戰時利潤的誘惑之下，也有一部分與英政府保持合作，這是印度反帝統一戰線內部所以發生裂痕的一個原因。但英國資本家與土著資本家利益的衝突，也一樣的強烈，遠東最大的也為印度人所經營的泰太鋼鐵廠與狄格堡油田，就都被英印府劃入『保護區』，並加以直接的管理與控制。（註十四）土著資本家與英國資本家間的矛盾已在急劇展開中。工人方面，對着帝國主義統治及其所進行的戰爭，不住加以反抗，罷工事件的日見增加，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英軍對上述狄格堡油田宣佈罷工的工人（罷工堅持至半年之久），會開槍掃射死傷多人；（註十五）而當意義非常重大的德里帝國會議開幕時，亞里他印度鐵鋼公司三千工人，又於同日（十月二十七日）宣佈大罷工。（註十六）此外，佔印度工業第一位的棉織業工人，參加罷工人數，竟達二十萬人，單由這一數目，我們已可以看出印度工人與帝國主義『合作』的程度。

（註十三）見上海大陸報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按霍華德前為上海字林西報主筆，現為英國情報部遠東司印度事務顧問，去年十一月至滬。

（註十四）見一九四〇年七月亞細亞 Baicoo Bativala 所作一文。

（註十五）見上文及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內幕（珠林版）中的殖民地與戰爭。

（註十六）見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 None Extra

四 印度在經濟上的重要性

正如印度每一工農一生下來就負債一樣，印度自走入現代世界之後，牠就是一個負債纍纍的國家。

印度民衆爲英國帝國主義者而負的債，百餘年來不斷在增加中。當一八五八年印度由東印度公司的私產，轉爲大英帝國殖民地之一的時候，印度政府爲着補償東印度公司的損失及其他，就負債一萬萬一千二百萬鎊，這債務，當然是由印度民衆負擔的。從一八五八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大英帝國在亞非兩洲所進行的一切戰爭，包括一八六三年的不丹戰爭，一八六七年的阿比西尼亞戰爭，一八七五年的畢拉克戰爭，一八七九——八一年的阿富汗戰爭，一八八二——九二年邊界間若干小規模的戰爭，以及一八八六年的緬甸戰爭，（英國前後三次進攻中國，和侵略阿富汗與波斯，奪取新嘉坡與錫蘭，和尼泊爾等並未計及）使印度的債務，又增加了六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接着就是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這戰爭使印度『貢獻』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連別的一切計算起來，目下印度所負債務總額，共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多，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扭負。

現在戰爭又再度爆發了，這戰爭甚至連富有的大英帝國，也感到難以應付。於是，牠對各殖

民地，特別是印度的榨取和剝削，就比以前任何一次的戰爭來得兇狠。戰爭現在還未終止，牠所負債務的數目究竟要比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大多少，我們還無從預知，但印度民衆之必然遭逢有歷史以來空前的苦難，却是無須說明的。

爲着應付巨額的費用，一九四〇年印度政府又增加了三項稅收的稅額，並提高火車的運費。此外，自一九四〇年六月起，牠又發動了印度國防儲蓄運動，並設立一個儲蓄委員會，以強迫的方法，使一切的窮人獻出最後的一個銅板。同時還有所謂獻機運動，迫使民衆捐款給英國購置飛機。由民間勒索得來的，至去年九月十六日爲止，共達一，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約一九，五〇〇，〇〇〇盧比），由印度政府匯出的，至去年九月底止，則達三八六，〇〇〇英鎊。此外，由民衆湊集匯至倫敦作爲空襲受傷人員救濟金的數目，也達一五〇，〇〇〇英鎊。（註十七）

在英國強大壓力之下，印度政府又發行了三種戰債，其一利息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一，其二利息百分之三，其一無利息，銀幣中的銀色成分已經降低。印度王公——英國在印的第五縱隊——爲媚媚倫敦也竭盡其能力，剝削各土著王國轄下的民衆。

誰都知道，對外貿易是取得軍費的來源之一。英國認爲印度的入口貿易必須減低，而出口則因戰事需要，必然增加，正如第一次歐戰時候一樣，這樣就可以使印度的貿易均趨於有利，從而英國就可以奪取印度對外貿易所得的盈利，用來償付對英的債務，包括英國在印十萬萬鎊投資的利息。此外，印度中央政府又授權印度準備銀行，根據所謂國防法，管理一切貨幣、金條、證

（註十七）見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英文大美晚報與十月三日上海申報

券、外匯等，並規定一盧比等於一先令六便士的比價（正價爲一先令四便士），這樣，印度民衆所受的損失異常重大，而印度的金融，已完全爲準備銀行所控制，結果使印度民衆的血液又作大量的流出。在英國對德宣戰已達一年半的現在，究竟牠已從印度絞榨去了多少，我們還無法知道，但其數目必然十分驚人，那是可以斷言的。

所有這些吸血的野蠻的剝削，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正用種種方法加以掩飾。在字林西報所發表的一篇特稿中，曾有一段這樣說：

『印度中央政府的稅收約六千萬鎊，十一省的全部稅收的數目也正相同。因此，撇開各印度王國的稅收不論，印度每年用作爲行政上之用的稅額，僅一萬萬二千萬英鎊，這數目與一八八六，〇〇〇方哩與二萬萬五千九百萬人口比起來，真是微乎其微。政府爲着應付戰時的需要，遲早總要增稅。印度的債務差不多都是生產性的。牠的賦稅很輕，而其債務近來因匯水的回漲而有顯著的低落。……』（註十八）

就我們所知，政府每年稅收，是在一萬萬五千萬鎊至一萬萬七千五百萬鎊之間，但要緊的不是稅收，而是政府所吸收的公債，這公債近八十年來，由一萬萬鎊增至九萬萬鎊，這就是說，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即一萬萬鎊；但國家的收入，每年僅只增加百分之一而已。其次，我們不問債務是否是生產性，我們要問的，是誰是債主。不用說，一切的利益統統歸由英國資本家，因爲在印度所負九萬萬鎊債務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就在英國投資者手裏。最後，所謂賦稅很輕云云，

（註十八）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字林西報（N.O.D.N.）

只是一種荒謬的節詞。在世界各個賦稅最重的國家中，印度與中國大概居於首位。結果，印度民衆的生活就非常痛苦難堪。在巴列伐拉女工（Bricoo Batiwala）所作的印度的呼聲中（一九四〇年七月亞細亞），就有如下一段動人的描寫：

『印度生活程度現在不斷的高漲着，早已窮困不堪的印度農工，更感到生活的困難。印度當局竟調動軍隊，向抗議食糧價格過份高漲的羣衆開槍射擊。普通工人如果每天能獲一餐，已屬萬幸。據英國醫官報告，印度人營養不良的工人已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一。如孔坡和孟買等城的紡織工業區，工人由於糧食市價狂漲，工資不夠購買食物，已有不少的暴動。』
『印度物價將繼續高漲，並要像上次歐戰中間，再度償付大量的血汗金錢。上次歐戰期內，英政府曾使「印度流乾了血。」在這次戰爭中，印度又感到戰爭所賜予的重負。……』
英國帝國主義爲奪得利潤而製造人工飢荒的成績，在一百年前即已有了美滿的表現了，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便有詳盡的說明。無論如何，像英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果不是靠着各殖民地，特別是印度民衆血液的供養，牠早已不能存在了。

五 正義與民主的幻滅

大英帝國對印度的殘酷的剝削，現在正隨着戰爭的緊張而加緊。去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印度德里所開的德里會議（參加者計有印度，澳大利亞，香港，新西蘭，南非，東非，南羅德西亞，巴勒斯坦，緬甸，錫蘭，馬來亞等），就是英帝國主義者爲準備更大戰爭而召集的。這會議的目

的，正如同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評所指出的那樣，是在增加帝國各成員間的自由合作，促進其發展，開發與資源，並使他們對帝國的貢獻能夠擴大增加而富於組織性。換句話說，大英帝國的各個奴隸總管，在這個會議中討論了如何增進剝削的效能、範圍和數量，以達到支持並戰勝現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就可以明白，英國爲什麼死也不願印度獲得自由與獨立，同樣，我們由此也可以明白，大英帝國雖然口口聲聲說着爲世界的民治與自由，爲世界的文明與秩序而戰，但牠本身的行動，却完全是反民治反自由，摧殘文明與破壞秩序的行動，牠的歷史是侵略者最大罪惡的紀錄。當牠們那雙滿染着殖民地奴隸的鮮血的雙手，高舉起『正義與民主』的旗幟時，印度人民却失去一切最低限度的民主的自由，印度牢獄裏塞滿着爲正義而戰的勇士。這一致命的矛盾，充分說明了牠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而不是保存民治的正義戰爭。正如印度國民大會的宣言所說的一樣：『如果英國爲民主主義而戰，那末牠必須消滅帝國主義，並在印度建設完全的民主主義。自決，設立選民會議，和由印度人民指導將來的政策三要點，英政府必須接受。……』英政府對這一宣言的回答，是大批著名民族革命運動者的逮捕，國民大會的數十領袖，至今尚有『自由』的，就只有甘地一人而已。由此英國帝國主義者已從印度問題上揭破了牠們的假面具。其實，這倒沒有值得怪異的地方，可怪可異的，倒是中國的論客們與政客們，現在正在歌頌英國，歌頌這所謂民主的戰爭，並願意與這樣的一個壓迫中國已達百年的國家，並肩作戰！須知利用英日的矛盾，爭取英國的援助，和歌頌以及參加帝國主義爭是絕對不同的兩回事啊！

意大利故事

高爾基

花 瓣

悶熱的正午，遠遠的，剛響過一聲午砲——聲音像打破一個巨大的臭蛋，輕鬆而可笑，在砲聲震動的空氣中，感到一陣刺鼻的街市的臭氣，劇烈的植物油、大蒜、葡萄酒和醇釀的垃圾的味兒。

在砲聲的沉重的喘息中，南國正午炎熱的喧囂，一剎間碰在街面的熱石頭上，又重新跳起來，變成一條混渾的大河向海中流去。

街市宛如滿地刺繡的神父的法衣，光艷而多彩。在街市的深情的叫囂，動蕩和陰險聲中，虔誠的響徹着生活之歌。每個城市都是人們的勞動所建造的宮殿，一切的工作也都是對未來的祈禱。

中天的太陽眩耀着白熱的藍空，一道灼熱的青白的光，好似從天空的一點，向地面和海面落

下來，深深刺進街市的石塊和水流之中，海面閃着細緻的光稜，像是用銀絲織成的輕綢。碧色的暖波夢也似的搖蕩，輕輕的洗着邊岸，低唱着生活與幸福的源泉——太陽的歌。

一羣滿身塵埃和油汗的人，歡樂的叫嚷着，去吃午餐了；有很多人望海邊跑，飛快的把灰色的衣服脫去，跳進海水裏，——微黑的肉體浮在水中，小得像一粒飄在一大杯葡萄酒裏的灰塵。

水花像珠珠似的激起來，暢快的身體發出歡樂的呼叫，高聲的笑，孩子似的尖音——這一切，和因人們的激動而打碎了的海面虹彩的碎片，都變成對太陽的歡樂的祭品。

人行道上照着高房子的巨影，四個馬路工人蹲坐着料理午餐，——身邊堆積着乾硬的石塊。一個被塵沙弄成灰色的白髮老頭子，剃着貪饞的眼睛，用刀子切一條長麵包，想切得大小均勻。他頭上戴一頂紅絨線便帽，帽上的流蘇掛到臉上。老頭兒把使徒彼得似的大腦袋搖搖晃晃的，鸚鵡鼻子發出咻咻的喘息，鼻孔漲得挺大。

在暖熱的石板上，一個黑銅色的小伙子，甲蟲似的伏在老頭兒身邊。麵包片碰着他的臉，他受了打攪似的把眼睛睜睜，像在做夢似的，嘴裏嗡嗡的哼着調兒。

另一個小伙子一手拿瓶葡萄酒，一手肘下挾一個小紙包，纏着頸子向他們走過來，嘴裏像鳥兒一般高聲的唱，因此他全不知道，從裹着酒瓶的麥桿薦中，漏着濃厚的大點的葡萄酒，像紅寶

石一般，晶紅燦爛，一滴滴滴在地上。

老頭兒望見了，把麵包和刀子在小伙子身邊一放，着急的搖着手，呼喚另一個小伙子：

『啊唷，走快些，瞎了麼？瞧，這葡萄酒！』

那小伙子把酒瓶提高到臉邊，透一口氣，急忙跑到碼頭工人身邊——他們立刻動起手來，拍着瓶子氣鼓鼓嚷，於是，小伙子射箭似的跑到哪個屋子裏，拿了一只黃色大碗，又很快的跑回來。

他們把碗放在地上，老頭兒小心地把紅色的液體倒在碗裏——四個人的眼睛盯住葡萄酒中太陽的光稜，大夥兒都貪饞的抹了抹乾燥的嘴唇。

路邊走過一個淡綠衣衫，黑髮包一條金線綉邊頭巾的婦人，紅的高跟鞋子閣閣的響，她手裏還攙一個鬢髮的小女孩，女孩右手拿兩枝紅紅的石竹花，蕩呀蕩的，走一步搖一搖身子，嘴裏唱着：

『O—ma, O, Ma, O, —Mia naa……』

當她走到老馬路工人的身後，站下來不出聲了。伸起身子，從老頭兒肩上望望在黃碗裏流動的葡萄酒，酒液好似接唱她的歌，遍注下來，邊發出聲響。

女孩子把自己的手從母親手中掙出來，在花上摘下幾片花瓣丟進酒碗裏。

四個人駭了一跳，發怒的抬起蒙塵的腦袋——女孩子拍拍小手，蹦蹦小腿，笑了。母親發了窘，大聲訓斥了什麼話，拉開她的手。小伙子捧着肚子大笑起來。在碗裏，泛着黑光的葡萄酒，飄着一片花瓣，像一只玫瑰色的小舟。

老頭兒從哪兒拿出一只玻璃杯，連花瓣把酒倒進杯裏，岸然的直起膝頭，把杯子舉到口邊，勸慰地，認真的說：

『沒有關係，老弟，小孩子的東西——同上帝的一樣——美麗的太太，祝你健康，還有小小姐，祝你健康！願你變得媽媽一樣美，比你媽媽更幸福，一倍……』

灰鬍子浸進酒裏，眯一眯眼，動動勾曲的鼻子，慢慢兒喝下了黑色的酒漿。

母親笑着點點頭，拉起女孩的手，向一邊走開了。女孩小足踏着石板地，搖着身子，皺着眉叫哼：

『O—ma O—, Mia mia……』

馬路工人懶懶的抬起了頭，望望葡萄酒和女孩的背影。他們以南方人快速的聲調互相講着，笑着，望着。

碗裏的葡事酒上，飄飄着紅紅的花瓣。

海在歌唱，街市在喙喙，太陽編造着故事，炎炎的輝耀着。

隧 道

一口幽靜的碧湖，四周環繞着長年積雪的崇山。公園像黑的花邊，形成美麗的皺襞，倒映湖面。湖邊有許多臨水的白屋，好像用白糖堆砌而成。四周的一切，相似嬰兒的酣睡。

早晨，從山頭飄來清幽的花香。太陽剛剛昇上來。草木的葉子上還閃爍着露珠。道路像一條灰色的帶子，拋投在靜寂的山峽；這雖然都是用石塊砌成的，看去却跟絲絨一般的柔軟，叫人想用手去撫觸。

在一堆碎石邊，坐着一個甲蟲似的黧黑的工人，他的胸頭佩着徽章，臉色英邁而和氣。

青銅色的肘頭支在膝上，抬起了腦袋，望着一個站在栗樹底下過路人的臉在說：

『兄弟，這是在辛博龍隧道工程中得來的獎章。』

於是，低眼望着胸口，對一塊精緻的小金屬片微笑了：『噓噓，一切工作，引不起興味，做起來總是苦的，可是一旦發生了興味，那就不同了；不過——一句話，要發生興味就不容易！』他對太陽一笑，輕輕搖着頭，而且突然興奮起來，揮起了手，眼中發出光輝。

『有時候簡直有些害怕，到底是泥土啦，你不能不難受，你說吧？當我們在山裏掘了洞，爬

進深深的洞子裏邊去——大地就在這洞子裏氣勢兇兇的迎接我們，它向我們吹來熱的呼吸，叫人吹得心裏難過起來，頭昏腦漲，骨節發痛——這一切，我都經驗過了！以後它又拿石塊扔我們，拿滾湯燙我們，這才叫怕人呢！有時候手燈邊的水會發紅。我那老子就對我說——我們把土地弄傷了，它要用自己的血來淹死我們，燒殺我們，替自己報仇。當然這是空想的話，可是在深深的地底下，悶窒的黑暗中，咽鳴的水流聲，和觸在石上的鐵器聲中，聽了這樣的話，人就會完全忘掉是空想。兄弟，人在那種地方，事都跟空想一樣。到底咱們人是這樣的小，咱們打了洞的山是高得快要碰到天空。啊唷，要不親身經驗，是不會明白的！太陽早晨昇起來，也照不進咱們打了的洞，和爬進這洞裏去的小小的人，太陽只是帶着悲傷的樣子，望着爬進大地之懷裏去的人們的影子——做人是應的見見這種機器，和山的苦惱的樣子，聽聽那種深洞底下暗黑的嗡嗡聲，那種跟狂人的惡笑一般的炸爆聲的。

他望望自己兩只手，把青掛子上的符號摸了一下，輕輕的嘆了一聲：

『人有做工的本領，』他昂然的說了：『對啦，兄弟，一個小小的人，只要他想像工——他就有本領什麼東西都鑽得穿！你得相信，這種小小的人，他們想像的事，結果是沒有一件做不了的。可是我的老子，開頭他不相信，他說：「要穿過一座山，從本國通到外國，這是違反了上帝把山當城，區別境界的意志的，你們得明白，馬唐娜一定不會幫助咱們的！」可是，這個話並不

對，馬唐娜永遠幫助愛她的人，到了好久以後，老子也就相信我現在說的話，因了他感到自己比山還高，比山還強了。有時候，碰到什麼過時過節的日子，對着放在桌子上的葡萄酒，他就對我和其他的人大講道理了：

「『上帝的孩子們！』這是老子說話時第一句口頭禪，因為他是一個好教徒：『別這樣跟土地作仇吧，土地受了傷，一定要替自己報仇的，末了，土地總是不會輸的！瞧着吧，等咱們掘到山的心窩裏，碰着那顆心——山的心一定會燒死咱們，把火扔到咱們身上。因為地心裏都是火，這是誰都知道的。開墾土地——這是幫助土地的豐收——那是咱們的本分，可是咱們現在是破壞了土地的面皮，改變了土地的容貌。咱們越是掘得深，空氣一定越熱，呼吸一定越難』……」

聽的人用兩手的指頭抹抹嘴唇，輕輕的笑。

「這可不是老子一個人的想法，不，事實上也就是這樣——越是深，地道裏也越是熱，害病的人一天天多起來，有很多人暈倒地上。再加熱的泉水滾滾的流出來，地層從頭頂傾下來，這樣的，兩個魯格諾來的伙伴，到頭是發了瘋了。晚上，在我們的宿舍裏，好多人講夢話，發夢魘，駭怕得從床上跳落來……」

「『對不對，我沒有說錯吧？』老子滿眼恐怖，劇烈的咳嗆着說，……『對不對，我不是早說過了？』他又說：『土地，是不能觸犯它的！』」

「到頭，老子就睡倒了，再也沒有起來。他倔強得很，跟死神頑固的鬥了三個多禮拜，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說一句怨話。」

「喂，保羅，我的勞苦這就算完了，」有一天半夜裏他對我說：「當心自己的身體，你快回家去，馬唐娜會保佑你！」說着，閉了眼睛，喘着氣，沉默了一下。」

聽的人站起身子望了望山，伸一個懶腰，把骨節都弄作聲音來。

他拉了我的手到自己身邊，說——「兄弟，我這是真實的話！」保羅，我相信這工事終會成功的——咱們會在半山腰裏，碰到從對面掘過來的人——你相信麼？」他說。

「我相信的。」

「好，兒子，你一定得相信。萬事要有一個好的出發點，要信仰上帝。馬唐娜對於好的工作，會求上帝來幫助的。兒子，我托你一件事，要是那日子到來了，要是你碰到對面掘過來的人，你就到我的坟上來，對我說——爸爸，事情成功了，我也急着想知道的。」

「這是很好的事情，兄弟，所以我就答應了。說了這話之後，第五天他就死了。可是死前兩天，他要我跟別的伙伴，把他葬在他自己工作的地道裏，他要求了好幾天，好像並不是昏迷的話

「從對方掘過來的人，跟我們碰頭，是老子死後三十個禮拜了——兄弟，這一天簡直發瘋了

！在地底黑暗的地方，我們聽到對方工事的聲響——這是在我們這樣小小的人，一時三刻可以壓爛的重量底下——你想想——在這樣的地底下，聽到向我們過來的人聲！

『有好好久好久的時候，我們聽到轟轟的聲音，這聲音，一天天明白起來，於是我們就歡喜得跟打了勝仗一樣——我們好似瘋魔了，好似忘掉了自己，也覺不到疲倦，也不等上面的指揮，拚命的工作，——這真出色啦，好像在明媚的陽光中大跳舞，真的，這是實在的話！我們變得跟孩子一樣可愛，變得非常的和氣。要是你想想——跟穿山甲一樣，整年整月鑽在地底下的黑暗中望碰到人的希望是多麼強，多麼的忍耐不住！』

他全身發起熱來，挨近了聽的人，以深情的眼凝視着別人的眼，低聲的，充滿歡喜的說了下去：

『到頭，地層打穿了，從隙縫裏露出火炬的紅光，那時候，每個人的黑臉上都流出歡喜的眼淚，以後，火炬跟更多的臉，而且哄起勝利和歡喜的叫喊——這是一輩子最好的日子。我一想起來——我就覺到活得有意思。我可以對你說，我有工作，我的工作是非常的神聖的。當我們從地底下走到太陽光下，我們伏在泥土裏，哭着接吻了……這好像是童話一樣，叫人有說不出的快活！以後，我們吻了打敗仗的山，吻了大地——兄弟，這一天，大地也跟平時不同，我覺得跟它特別親熱，我們互相非常的瞭解了，我愛它，像愛女子一般！』

『當然我上老子那兒去了，我知道死人不會聽見我的話，可是我依舊去了，我必須尊敬爲我們做工，比我們更受難的人的希望——你說對不對呢？』

『對啦，我上老子的坟頭去，照老子的遺囑，我的腳踏着泥地：』

『爸爸——完成了，』我說了：『人得勝了，成功了爸爸！』』

本輯介紹

本輯脫期。補救辦法，改出合輯（十三十四）。脫期原因，非常簡單：時逢春節，印刷所同人照例要快樂幾天，就此拖延了求知出版日期（編者當時雖想盡辦法，但已無濟於事。下次春節，決事先按排好，免蹈脫期覆轍）。告罪，告罪！合輯祇售一元，定價特廉以誌歉意。告訴讀者，目前紙價又漲了三〇%，排工漲上一〇〇%，因此從下輯起，定價四角五分的，須改爲七角。

許多讀者來信要求求知登載關於這次新四軍事變的文章。的確，新四軍問題很有引起仇快親痛的內訌而瓦解抗戰陣線的危險。子強先生對於這次事變，以嚴正的態度，根據客觀事實，詳加分析，並指出它是中國「存亡的關鍵」，無異是民族的S.O.S.

青之先生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亦是一篇抗戰陣線發生重大裂痕時的應時巨作。全文長四萬餘言，本輯載二分之一。作者對其史的發展、特徵等理論方面的敘述，非常詳細。而尤以第三節特別精彩。

日人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認識，確如譯者所說，是日本人比較能客觀而正確地理解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文章。特別是它能指出國共合作是抗建的偉大力量，這點足以羞死吃摩擦飯與製造反共內戰的傢伙。這樣說來，它在不意中亦成爲應時的文章了。該文小節目由編者寫上，順便聲明。

方舟先生的論中國化，是作者經過半年構思才慎重下筆的學術論文。它不僅立論正確，而且用語與取材都非常大衆化，文章本身已達「中國化」之大乘。

孟堅先生的生命哲學小討論是一篇關於哲學方面的文章，——是從生物學的立場來批評唯生哲學的文章。如果唯生哲學者或其他學者不同意這種批評，不妨把它當作挑戰書，擴大範圍，來一次生命哲學大論戰，對於中國哲學界是有相當意義的。

印度在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上，與中國有着同樣重大意義。可惜國人對於印度問題很少關心。君萱先生是中國稀有的印度問題的權威者，他這次對求知又寫了一篇假如英國失去印度，不但爲求知增光不少，同時亦是讀者諸君的幸福。

最後，意大利故事係一九〇五年後高爾基寓居拿波里所作，記當時種種見聞南歐美麗的大自然，勞苦大衆的生活和鬥爭，神奇的傳說和樸素的風習，全二十七篇。篇名係譯者葉素先生爲連續發表的便利，另行加上的。

73



BC

93.09

)

\$1.00